

茂名历史人物传记

信宜稿件（修改稿）

2006年7月20日

《茂名历史人物传记》信宜稿件

目 录

(按传主生年先后为序)

- 1、唐代堪舆大师杨筠松 1
- 2、信宜安莪起义首领何名科 4
- 3、晚清高州三大诗人之一刘汝新 7
- 4、打响太平天国革命起义第一枪的凌十八 9
- 5、“大洪国”南兴王陈金 16
- 6、农民雕塑家、壁画家李南兴 22
- 7、茂名地区出洋经商先驱陈铭盘 24
- 8、民主革命宣传家李怀霜 26
- 9、华侨企业家李季濂 31
- 10、民国时期在经济建设有建树的广东省主席林云陔 33
- 11、保卫孙中山脱险的总统府特务长陆志云 38
- 12、勳勤大学校长陆嗣曾 40
- 13、“服务最有恒心的教育家”林砺儒 42
- 14、救护孙中山脱险的总统府参军林树巍 52

15、代理广东省主席、中将文官陆幼刚	57
16、被孙中山授予中将司令的梁若谷	59
17、十九路军少将副师长陈任之	61
18、岭南画派画虎艺术大师周璠璋	63
19、信宜农民运动的先驱梁本荣	66
20、著名侨领李孝式	68
21、抗日中将军长梁汉明	70
22、中共信宜县委第一位书记罗克明	74
23、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吹鼓手林柏生	77
24、解放军首批授衔女上校谢荃	81
25、模范军属罗绍秀	83
26、隐蔽战线上的英雄陈达增	87
27、编辑家、作家、文艺理论家林元	93
28、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	96
29、与爱人同赴刑场的革命烈士丘壁坚	100
30、抗日战争空军英雄梁深	105
31、血沃钦州的革命烈士林芳	108
32、著名农民作家杨干华	110
33、战场救护模范吕志金	117

唐代堪輿大师杨筠松

陈启著

杨筠松（834～900年），字叔茂、又字益，号玄赤，又号救贫，世人称救贫仙人，是唐代堪輿大师。生于唐大和八年（公元834年）三月初八日，窦州人（广东信宜人）。江西堪輿形法理论的祖师。

杨筠松的父亲杨淑贤生有三子：长子筠翌，次子筠宾，三子筠松。筠松幼习诗书，聪颖过人，一览无遗，十七岁便登科及第。后为唐僖宗朝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广明中（公元880年），黄巢破京城，乃断发入昆仑山步龙。后至虔州（江西赣州），以地理术行于世，民间称救贫先生。唐光化三年（公元900年）三月初九日，病逝于虔州，终年67岁（66周岁），葬于虔州于都寒信峡药口坝。

杨筠松在虔州期间，最早在虔州崇贤里黄禅寺遇到曾文迪，邂逅于方丈之内，晤谈中，曾文迪被杨筠松非凡的风水学识所倾倒，遂拜杨筠松为师，朝夕跟随，竭尽弟子之礼。后云游山川，寻龙捉脉，得杨筠松尽心指点，观龙以势，察穴以形，峦头砂水，体用兼妙。曾文迪遂渐通堪輿之大道，成为杨筠松第一个高足。其后，廖瑀、范越风、厉伯绍、刘淼、叶七、邵庭监等先后投入其门下学艺，后来均成为著名的堪輿大家。杨筠松抛弃方位本身既

有吉凶的信条，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物、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位于山灵水秀之处，逐渐演化发展，便形成了风水“形法理论”，“峦头之法”。

形法理论“肇于赣州杨筠松、曾文迪、赖大有、谢子逸辈，其说为主于形势，原其所起，即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①，故又名赣派风水也。形成觅龙、察砂、观水、点穴等考察山水、踏勘地形的四个程式。

杨筠松著作有《疑龙经》、《撼龙经》、《立锥赋》、《黑囊经》、《三十六龙》、《青囊奥语》、《一粒粟》、《都天宝照经》、《天元乌兔经》、《葬法倒杖》、《天玉经·内传》、《天玉经·外编》等书。其著述的风水形法理论，为后世风水家所推崇。

形法理论的内传经过^②：祖师杨筠松二传（旁传）曾文迪、廖瑀、范越风、厉伯绍、刘淼、叶七、邵庭监；曾文迪、三传赖文俊（赖布衣）、曾十七；范越风传苏粹明、方十九、张五朗；赖文俊四传丁珏、刘雍；丁珏五传卜应天，刘雍传李普照；李普照六传廖金精；廖金精七传孙世南、李玉才、王应元；孙世南八传赖白发、曾道立，王应元传谢玠；赖白发九传李鸦鹊；李鸦鹊十传钟可朝；钟可朝十一传唐九仙、陈希夷（唐、陈以下均入宋代）；唐九仙十二传胡矮仙、张子微、谢子逸、蔡神兴；胡矮仙十三传刘七碗、郑颜渊、刘子猷、丁应之、丘公亮；刘七碗十四传刘景清、王禄道、建心仙；刘景清十五传刘应宝，王禄道传刘勾力、吴景鸾、蔡二郎、刘子仙、宋花师；刘应宝十六传刘元正；刘元正十七传刘景明、刘种桃、刘谦；刘景明十八传刘风道、谢和卿，刘种桃传廖信甫，刘谦传萧子清；刘见道十九传刘云山、刘云峰、刘云岫，刘和卿传李莲洲；刘云山二十传孙伯岗。

孙伯岗是赣派风水谱系中有明确记载的代数最后一个传人。其后，赣派风水理论，在元、明、清时期的内传经过就不见记载了。但赣派风水理论与闽派风水理论互相竞争的结果，赣派风水

在明清时期取得压倒的优势，并定型为“读书人”的堪輿学。在明清时代成为堪輿术者十之九皆以杨救贫（筠松）的系统自居。认为杨救贫的风水学才是地理正宗。大江南北，凡风水学者，莫以“杨公”是瞻。如元朝大都（今北京）的选址人刘秉忠和明代著名风水学家廖均卿，就是其中的佼佼者。廖均卿是明朝十三陵区的首席选择家，其先祖为唐宋时期著名风水家廖瑀。廖均卿继承杨筠松赣派风水学理论，为明朝选择皇帝陵。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七月，“皇后徐氏崩，上命礼部尚书赵玘以明地理者廖均卿等往择地，得吉于昌平县东黄土山。”^③永乐皇帝“及车驾临视，封其为天寿山，以七年（公元1409年）五月己卯作长陵……自是列圣因之，皆兆于长陵左右而同为一域焉。”^④以后成为明十三陵。

近现代而至当代的风水学者，都实行杨筠松的风水理论，均尊他为中国堪輿祖师。

注：①清·赵翼：《陔馀丛考》。

②《古今图书集成》、《地理正宗》。

③④清·顾炎武：《昌平山水记》。

信宜安莪起义首领何名科

陈启著

何名科（1803~1851年），广东省信宜市安莪村人，清道光末年信宜天地会（又名添弟会）和安莪起义的领导人。

何名科出身贫苦，身材高大，练就一身好武艺。当过当铺的工人。后率胞弟何名颐、何名昭到广西容县，耕田度日。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加入天地会，与北流县天地会首领梁十八、梁二十、张四福等友善。

道光三十年，何名科与梁二十联合，各自立为总头目，以谢亚美为军师，陈二十大等为先锋，李四等为大头目，李仲大、麦亚二、梁十五等为头目，组织3000余人，于十一月在信宜安莪集中扎营起义，派队伍到岑溪县的平河、旱田坡，西宁县的上下濼，茂名县的南塘，化州县的宝圩，阳春县的淡水筹响。

十二月十四日（1851年1月15日），何名科率领起义军在茂名县黄塘击败高州镇左营哨头目、黄塘汛外委、把总李朝昌的官军，咸丰元年二月（1851年3月），分兵攻下平山司署；在石骨圩，把茂名知县胡宗政赶回县城；攻到帅堂，杀死练长、候选知县李景新，庠生邓茂林及练丁百余名；又大败地主兵于连塘的十

里塑；乘胜打到云炉、丰洞、谢鸡，离高州城仅 40 里。何名科声威大震。

二月二十九日（3 月 31 日），凌十八围攻玉林城。梁十八、梁二十率队参战，何名科占领容县黎村圩以为犄角。山嘴村黄姓地主团兵，袭杀其军师谢亚美。何名科率领千余人马扫荡山嘴村，生俘职员黄鹏翁。

三月（4 月），何名科往容县自良增集天地会众，合共 6000 人，开赴信宜丰冲，占据东镇，开仓济贫，又分兵从水口出东岸。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急忙命令高州镇总兵杨昌泗从钦州赶回信宜。四月二十五日（5 月 25 日），杨昌泗率兵 1200 名到达信宜县城。四月二十七日，何名科命令各队绕道从东南进攻信宜城。11 时许，前锋到达天后街，沿东江河岸列炮轰击，忽然，风雨大作，渡河攻城失利，何名科长子何绍邦及旗手数人阵亡。

是年五月（6 月），广西布政使劳崇光进驻梧州，派梧州副将伊什扎木率兵于初五（6 月 4 日）抵达容县山嘴村，与广东官兵合力围剿何名科起义军。初九，何名科往北流扩充队伍。十一日，何名科分兵三路，进攻伊什扎木兵营，从早上 7 时许打到下午 1 时许，仍攻不下。何名科率队经水文转移罗定休整。五月十三日，韩彦章率大队兵勇抵达安莪，邀集信宜团勇及高州兵，将何姓祠堂和何名科瓦屋拆毁焚烧，挖掉何姓始祖何有龙的山坟。五月十六日，千总黄英彪领兵围搜朱砂里五大山，保护家属的近百名起义军，全部英勇牺牲；何名科的母亲妻子儿女 6 人，何名昭的妻女 3 人，何名颐的妻子儿女 6 人，均被清兵逮捕。

何名科在罗定休整期间，向凌十八购买了 20 多尊大炮。七月二十七日（8 月 23 日），何名科与梁二十会合于黎村。八月初八

(9月3日)，何名科回师信宜金垌。十八日，过排田，进驻丰冲、扶参一带。二十七日，分兵攻蒲竹径堡。杨昌泗于闰八月初三(9月27日)向起义军发动攻击。起义军诈败，诱敌追至扶参大积利的狭小山窝，伏兵齐出，杀阳江镇标千总关镇江和外委沙兆麟。何名科乘胜猛扑贺洞敌营。杨昌泗不敢抵抗，骑马奔逃，官军全线崩溃。

闰八月十一日(10月5日)，徐广缙命令增城参将王学诗带兵千余名驻信宜县城大路街。十三日，何名科出东镇，分兵占据北界圩和金渠塘。二十日，袭杀六问堡练勇49人，迫使容县兵勇撤走。九月初二日(10月25日)，何名科率军潜越茶山岭，进占茂名西北的高山，拟从西南面包抄信宜县城；因北流兵堵截，折回金渠塘。

九月初五日(10月28日)，徐广缙增调惠来游击刘开泰带兵来信宜良窝村。何名科率队伍撤回东镇，击毙前来进攻的提标外委朱瑞贤和敌兵勇一批。初七日即领队伍转移怀乡。

是时，徐广缙、宗元醇正调动大批清兵全力围攻固守于罗镜圩的凌十八起义军，十分惧怕何名科与凌十八会合，急从罗镜前线抽调冯子材带兵往怀乡围剿。九月初十日(11月2日)夜间，冯子材带着300多人，偷袭扎在怀乡观古坪的何名科营寨。起义军伤亡很大，梁二十在战斗中牺牲。天明后，清军越来越多。何名科率队且战且退。得到水文澎骨六的帮助，进军岑溪的广平、大塘、南渡，转战容县、玉林、北流县。徐广缙、宗元醇命令广西东南各州县官兵堵截，广东的刘开泰、梁国安、冯子材分兵两路跟踪追击。起义军先后在玉林牛屎塘、平山圩、蒲塘圩、山心桥圩等，与玉林知州顾谐庚派来的山东候补藩经历闻勋、兴业县

把总黄雄升、兴业知县张晋圭等部激战，又遭沿途各乡团练围追堵截，损失不小。何名科命令部下抛弃辎重，分散隐蔽于贵县郭南里的雷村、新定村、宁村。咸丰元年九月二十七日（1851年11月19日），贵县兵勇、玉林团练前来围攻，何名科、何名颐、梁十八等被俘，被解到桂平杀害。

晚清高州三大诗人之一刘汝新

陈启著

刘汝新（1808～约1875年），字焕初，号锦川，广东省信宜东镇圩锦里人。幼年苦学，18岁中秀才；道光八年（1828年）中戊子科第六十二名举人；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戊戌科进士。始任陕西省澄城县，后改任淳化县知县。在任期间，曾镇压当地白莲教起义。不久调到奉天省（今辽宁省），先后任广宁、盖平知县。盖平地方偏僻，文化落后，他为帮助当地人提高文化，多方组织办教育，并亲自授课。清咸丰七年（1857年），刘汝新辞官归家，在乡间设馆授徒。

咸丰十一年（1861年），三水县天地会陈金率起义军进入信宜，以信宜城为大洪国首府。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刘汝新往广西北流县招募兵勇，拟偷袭县城，没有成功。

刘汝新在乡间设馆授徒十余年，学生称他为锦川先生。他的

书法效王羲之、王献之，非常遒劲，得者以为宝。他最喜欢写诗，居官、居家及咸丰十一年（1861年）避居梅都吟咏不辍，被称为“晚清高州三大诗人”之一。著有《藏云阁诗集》二卷，吴川状元林召棠、钱塘学使汪鸣銮作序。

鸦片战争的炮声，震动了正在昏睡的中国。三元里抗英、太平天国革命起义等一系列历史事件，使一向远离政治漩涡的岭南，变得动荡起来。信宜，成为凌十八起义的策源地和陈金“大洪国”的首府。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使不少文人陷入迷惘之中。他们感到封建王朝“挽不回”地衰败了，十分怀恋过去的“盛世”。这种怀旧的情调，在刘汝新的诗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以刘汝新的《铜鼓歌》为例。诗人借出土的铜鼓发一番幽思，从平定岭南的伏波将军，想到南征沪水的诸葛孔明。然而，伏波也好，孔明也好，皆已成为古人，他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独有这面铜鼓，深埋数千年后，却重见天日，“余响至今绕云岫”！刘汝新中进士后，当过几个县知县，后辞官归家。作为一个受过“皇恩”，领过“俸禄”的封建文人，哀叹封建王朝的衰败，怀念过去的“英雄”，是很自然的。但他没有再做“补天”之梦，而只愿象铜鼓那样长期隐居山间，“郁郁饱挹山川秀”。

刘汝新的诗，深沉凝炼，富有韵味。除《铜鼓歌》外，他的《藏云阁诗集》二卷520多首诗，受到著名文人林召棠和汪鸣銮的激赏，林召棠赞他的诗云：“音节兴象，逼真古人，当于陈射洪、张曲江求之；近体气清骨挺，结藻精美，七古大笔力，时有奇响。”然而在信宜流传最广，至今脍炙人口的，是他的七绝《游虎跳》：“杜鹃啼血染花丛，临水争妍石峡中。笑我寻春春寂寂，问花开处为谁红？”情调与《铜鼓歌》一致，但更为含蓄。就艺术而言，

他的诗作确实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

打响太平天国革命起义第一枪的凌十八

陈启著

凌十八（1819～1852年），名才锦，排行十八，故称凌十八，广东省信宜市钱排镇北内塘坳村人，信宜大寨起义（即凌十八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也是打响太平天国革命起义第一枪者。

凌十八生于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初九日（1819年10月27日），有五个弟弟：凌二十名捷锦，凌二十四名锦，凌二十八名挥锦，凌二十九名振锦，凌三十名扶锦。父亲凌玉超，是当地“大馆”的教书先生，希望他读书做官。他却崇拜《水浒》英雄，热衷习武，曾参加文、武秀才的考试，均未考中。

道光十八年（1838年）冬，凌玉超放弃教书，耕山种蓝。购买了塘坳一坑两岸的田地和山场，继而在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带领凌二十、凌二十四、凌二十八到广西平南县马练乡北胜山人村发展种蓝业，留凌十八在塘坳。这时，洪秀全组织的拜上帝会已在广西兴起，山人村胡以晃等一批农民、蓝农已先后入会。

作为邻居的凌玉超父子，因胡以晃的影响，凌二十、凌二十四参加了拜上帝会。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1848年1月），凌十八到平南县探望父亲，与胡以晃结识。胡以晃介绍他加入了拜上帝会。接着，又跟随胡以晃到当时拜上帝会的策源地桂平县紫荆山，拜见了洪秀全和冯云山。洪、冯与凌十八“共为结拜”。

凌十八奉命回到信宜，以大寮为根据地，大张旗鼓地宣传拜上帝教，鼓吹“有田同耕，有饭同吃”。贫苦农民纷纷加入拜上帝会，大寮附近以及莲塘、林洞、河坝等村不少农民都入了拜上帝会。罗定、高州、岑溪、北流、容县、陆川等地，也有人前来入会。大寮拜上帝会发展到几千人。

道光二十九年冬，凌十八到紫荆山向洪秀全、冯云山请示，于次年正月（1850年2月）回到大寮。正月十九日（3月2日），他把塘坳的田地、山场、房屋全部出卖，所得的钱全部用于创建军队。赶造兵器，拆神庙，毁佛像。周围的豪绅地主要求官府派兵镇压。同年四月（5月），县令官步霄下令解散大寮拜上帝会。凌十八继续扩大组织，并派凌二十四在塘坳以“卖茶水生理”为名，接待各地前来联系的人。

五月（1850年6月），凌十八再次赴紫荆山，向洪秀全、冯云山请示方略。官步霄于六月初五日（7月13日）派怀乡汛官同县差一起潜入塘坳，逮捕了凌二十四。七月初二日（8月9日），官府又派兵捉拿拜上帝会成员欧品庄。凌十八率领会众痛打县差王朝，救出欧品庄，烧毁为虎作伥的豪绅丘贤参的房屋。官步霄气急败坏，停考县试，与县绅陆达务、余士桢等借饷募勇“剿办”。凌十八在大寮团营，“拜旗”起义。以薛氏宗祠为指挥部，组织会众日夜练武，垒石据险，准备迎敌。又散发传单，揭露官步霄“陷

良索贿”、“逼变良民”的罪恶，点名要诛杀陆达务。同时，强迫地主减租减税，开仓济贫。

七月二十日（1850年8月27日），官步霄带领城守梁国安、富绅陆达务、练长余士桢及乡勇团练二千余人来攻，凌十八发出“尽杀诸妖”的号召，连夜转移到莲塘，在山岭设伏。官步霄设指挥部于云开，把兵勇分为四营包围莲塘，七月二十二日（8月29日）凌晨，大雾弥漫，凌十八率众秘密绕过陂头山、钱新，突袭梅子岭、大岭岗敌营；打伤孔传东，杀死余士桢，官兵损失很大。官步霄又雇罗镜打手谭拔超、彭肇昌等六百多人，与官兵一起，于二十六日（9月2日）再次发动进攻。凌十八又把敌军打败，杀死谭超拔。官步霄连夜逃回县城。

高州知府胡美彦改用绥抚政策，撤销官步霄职务，派茂名知县胡宗政到信宜办抚。八月十五日（9月20日），胡宗政找东镇老童生刘始进到大寮联系。凌十八为了争取时间，进一步发动群众，表示愿意谈判。胡宗政于八月二十六日（10月1日），带领几十人送凌二十四进莲塘。凌十八对着胡宗政，揭露富绅陆达务和云开、竹洞、洪冠等地的监生、地主雇请几百个“大毒”（打手），“杀毙大寮八十余命”，“五六十户尽遭焚毁”，搞得“六七百穷民无家可归”的残暴罪行；义正词严地宣布：“我等受金田之命，将起兵以谋天位”，斩其从人胡儒辉。九月初三日（10月7日），才派人送胡宗政出山。

道光三十年九月二十五日（1850年10月29日），萧朝贵以“天兄下凡”传言，指示大寮拜上帝会作好一切准备，待命令一到，即开赴广西团营。咸丰元年正月廿四日（1851年2月24日），凌十八以王晚为军师，凌二十八为先锋，挥师经北界、石砚，到

北流县扶来卡三里，折回茂名（今高州县）、化州，向广西陆川进发。起义军纪律严明，沿途宣传拜上帝教，扩展队伍，联合赖八、陈十六、梁十八、梁二十等部义军共五六千人，并吸收了天地会陈二所部。二月二十五日（3月27日），绕过陆川县城，进军马坡圩，打败玉林州幕客李康保和州判李庆福的人马，二十九日（3月31日），兵临玉林城下。

凌十八派先遣部队北上与太平军会合。此时，太平军正与清军在大湟江口大战，遂移营武宣东乡，凌十八得到错误情报，说清军云集金田，起义军势已败。他认为无所依归，决定取玉林州为根据地，以重兵攻打玉林城。他设司令部于南桥头文昌阁，打败富绅蒋文海募集的数千乡勇，把玉林城团团围住，玉林知州顾谐庚从博白镇压刘八回师，纠集北流、兴业等县官兵，均被凌十八打败，杀团总梁拱辰。

凌十八围攻玉林城，震惊了咸丰皇帝，他命令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巡抚周天爵及提督向荣，集结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省军队共1万多人，从东、西、南向凌十八起义军发动进攻。三月二十九日，起义军与强大的清军激战，死伤二千余人，先锋黄三、黄八被俘，军师王晚战死。此时，因清军堵截，又缺乏渡江舟船，先遣队与太平军会合的计划无法实现。四月初五日（5月5日）子夜，大雨滂沱，凌十八命士兵开炮，佯作攻城，挥师回粤。

凌十八起义军回到化州平定圩稍作休整，吸收了天地会吴三所部入伍，经北界、东镇回到大寮，拟“出岑溪而会金田”。

六月初五日（7月3日），高州总兵杨昌泗率千余人马向起义军进攻，凌十八率军迎战于楼坡。战方酣，下大雨，凌十八退

守怀乡。六月初八日，斩敌守备腾云龙，打败杨昌泗。守备姚麟转移到白鸡岭。六月二十五日，起义军奇袭白鸡岭敌营，杨昌泗、姚麟弃营而逃。凌十八乘胜撤离大寮，想从贵子入广西。因两广清军合力堵截而无法实现，便于七月十一日（8月7日），攻占罗定罗镜圩，队伍由三千余人发展到六千。

七月十五日，两广总督徐广缙率兵到高州。派巡道宗元醇带兵到信宜城，设立西路大营，截断起义军回信宜之路。八月初一日（8月27日）上午7时许，清军进攻罗镜圩，起义军炮火猛烈，清军无法迫近。初五日，清军派新会参将卫佐邦率兵扼守大镬营要隘。在太平圩设立东路大营，对罗镜圩形成合围。起义军进退不得，遂坚守罗镜。

凌十八凭险构筑三层防御工事：第一层，外围修筑坚固的土城20多华里，后筑炮楼炮台。第二层，在土城与圩之间的山林、水田、开阔地中筑大小炮台或陷坑、陷阱；树木中、塘边罗列炮位，纵横呼应；炮台前、各炮台间有陷坑。第三层，圩内又分里、中、外三层：外层是在圩外设置陷坑、陷阱；中层环圩开濠，濠内伏设大炮；圩内用砖堵住西圩大街口，惟留东圩出入，街口也坑堑重重，可通城内的入口设置炮台，遍地暗布铁钉竹签，遮盖浮土。与此同时，开仓济贫，发动群众，广储粮食，设置火药馆，自制火药。

从八月初十至九月十二日（9月5日~11月4日），清军多次进攻罗镜圩，均被起义军击退。徐广缙从广州调来大炮多尊，动用五千人马，分东、北、南三路进攻，无法攻下。又增加大炮12尊，分三路轮流轰击。土城轰塌了，起义军很快修复过来，清军仍无法前进一步。徐广缙气急败坏，从广州、佛山、封川、新

会、顺德、东莞、惠州、信宜、罗定、高州等地调来清兵万名，民团二千多人，把罗镜围得水泄不通。并于九月二十四日派高廉巡道宗元醇到水摆督战，“连战亦无功”。

正当凌十八领导起义军顽强抗击清军的围攻之际，起义军重要将领吴三却受肇庆知府李敦业派来的说客陈含光和高州府经历朱用孚所收买，于十月初三日（11月25日）拉拢陈二率众投敌。凌十八前去制止，只留住陈二所部。吴三率领的一千多人终于投降了清军，全被杀害。

十二月初十日（1852年1月30日），徐广缙赶来信宜，命令清军在罗镜圩外挖壕，壕中灌水；以挖起的泥土筑墙，企图将起义军困死。二十八日，凌十八派一千多人以试图突围姿态登上东山，猛轰敌营，诱敌攻打西圩，清军果然上当，开至西圩口，伏炮齐发，打死清兵百余名。二月十八日（4月7日）夜半，起义军用装满禾草的布袋和棉被填塞壕沟，爬上壕墙，杀掉巡逻兵，奇袭敌营。素称“胆勇为一军冠”的黄冈都司饶成龙被斩，把总徐德桂，冯子材及其他头目数人被砍伤，清兵百余人被杀。三月二十四日（5月12日），起义军计诱敌人深入东圩，截断其归路而全歼之，斩守备钟庆瑞。徐广缙老羞成怒，杀了千总邓登荣、卢振高，将千总黄遇春、蔡雄枷号示众后流放。

四月初五日（5月23日），徐广缙调高州镇总兵福兴率所部进营水摆。初七日，清军分八路出击，起义军则于巷口墙眼用伏炮毒弹还击，毒弹中装满铁钉铅片，清军死伤三四百人。此后清军连攻十余日，都被起义军击退。福兴令陈二的舅舅作离间计。陈二重走吴三老路，于四月二十六日（6月13日）晚率部出降，到土冈炮台附近被清军全部杀害。

凌十八面对清军围困，天天都以就有广西兄弟前来迎接的话鼓励将士众志成城，清军合围半年多竟攻不下。自吴三、陈二叛变之后，剩下的都是大寮拜上帝会的会众，“党固心坚”，誓同清军血战到底。清军连攻连溃，死伤六百余人，守备卫佐邦，千总黄曜吉、萨国亮、把总何振标、外委陈应东，均被打伤。

五月初一日（6月18日），徐广缙被调往广西镇压太平军，广东巡抚叶名琛到罗定指挥罗镜军事。他整编队伍，更替伤残兵员，裁撤作战不力者；从广州、封川、佛山调来兵勇2700人。加紧制造武器，加强封锁，以绝义军米粮弹药。于六月初四和六月初八日（7月20日和24日）夜间，两次派遣小部队攻鬼子埕炮台和火药库，砍伤凌二十八腿。起义军在主将受伤的情况下，仍斗志不衰。诵经之声，犹闻于敌营，使叶名琛十分吃惊。

咸丰二年六月十二日（1852年7月28日）凌晨，清兵倾巢而出，分东、西、中三路，每路各分三层五队，猛扑罗镜圩。此时，起义军弹尽粮绝，剩下不过百人，仍以最后一点气力，与敌肉搏，打伤打死清军337人。最后，全军壮烈牺牲。徐广缙、叶名琛向清廷奏捷论凌十八起义军说：“但凡入会，从此执迷不悟，视死如归，较之寻常教会各匪，迥不相侔”。又说：“逆党之坚忍信从，实为历来各匪徒所罕见。”光绪《信宜县志》说：“其党数千人，竞相从饿死而不变，邪教之感人乃至是哉”。证明凌十八英勇不屈的英雄气概。

凌十八领导的凌十八起义，是广东近代史上农民起义重要组成部分，揭开了广东农民大起义的扉页。凌十八创建了以信宜为中心的拜上帝会基地（是洪秀全创立的拜上帝会五大基地之一），举行武装起义斗争长达两年多，先后驰骋两省三州六县，在起义军打

击下，清廷不仅损兵折将，而且耗去白银八十多万两，朝野震动。同时，凌十八起义军牵制了清军一部分力量，大大减轻了洪秀全金田太平军方面的压力，对金田起义起了重要的支援、配合作用，对太平天国早期革命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凌十八无限忠于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毁家以赴，举室从征，满门忠烈，宁死不屈，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早期的英雄。

“大洪国”南兴王陈金

陈启著 梁承光

陈金（1820~1863年），广东三水人。箍桶出身，与朱子仪、卢伟同为广东西江三合会组织“洪义堂”首领。清咸丰四年（1854年）六月份，在三水县范湖圩竖旗举事，据芦苞等地。攻三水县城不下，率军北上，配合其他起义军攻克清远县城。旋退回芦苞，驶船500余艘沿北江直上，与从陆路北上的李文茂、何六、甘先、陈开等部起义军会合。咸丰五年五月，联军入湖南，占郴州，联合湖南天地会与清军作战，互有胜败。

咸丰五年十二月，陈金率万余人回师广东，活动于连州、阳山、英德、清远一带。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陈金率军西进。八月初九（9月26日）占领怀集县，宣告建立“大洪国”政权，称南兴王，其下有元帅、上柱国、尚书、太尉、都尉、都

督、府尹、主政、中书、知县等职官。后继续攻克开建县城，遂以怀集、开建为根据地，势力及广宁、德庆、封川、连山等广大地区。

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九日（1858年6月10日），陈金大败清军于德庆，击毙肇罗道张承谏以下千余人。七月，陈金攻广西贺县，九月破坡。翌年（1859年）六月，曾与侯成带内讧，怀集、开建相继陷于清军。陈金即以贺县为根据地，活动于广西昭平、平乐、富川及湘桂边境。

咸丰十年（1860年）五月，贺县陷于清军。陈金集合余众万余人，南下广西苍梧，与罗华观部起义军合作。十月，陈金经梧州、藤县，于十二月（1861年1月）占领岑溪县南渡、水文。此时，信宜天地会首领、秀才李可钟把信宜县内的虚实向陈金报告，建议迅速乘虚攻进信宜县，占据县城。

咸丰十一年正月十五日（1861年2月24日），陈金派郑金、刘超分两路先进入信宜。次日攻破任姓堡，杀死地主兵200人。正月二十日，陈军大败清军都司杨绍能、千总陈辅龙于信宜安莪。二十三日夜，攻破蒲竹径堡，斩地主豪绅余廷谔，杀死地主兵600多人。二十五日，攻下朱砂大塘面堡。二月初三日，陈军猛攻信宜池洞丰冲，杨绍能、陈辅龙不战而逃；信宜知县崇原驻横茶，闻讯，仓惶逃遁，过县城而不敢入；信宜典史谢鸿章、教谕李煜林、训导张文鼎亦弃城而逃。陈军如入无人之境，下东镇，直趋县城。二月初四日（1861年3月14日）黎明，陈军进入信宜县城（镇隆）。

咸丰十一年二月十七日（1861年3月27日），陈金进入信宜县城（镇隆），以县城为大洪国首府，仍称南兴王，以学官（孔

庙)为王宫,信宜县署衙门为元帅府,大路街洗太庙为迎宾馆(又称招贤馆)。陈金 封信宜李可钟为给事中,协助处理政务;郑金 为元帅;封李可钟族弟、信宜天地首领之一的李一贯为都督。取得信宜天地会的全力支持。又派员分封西宁、封川、岑溪、容县等县天地会首领。还取得阳江、恩平、阳春等县农民起义队伍的声援。陈金 拥兵 10 万余众,据地千里,威震粤桂边地区。陈金 采取政治上严厉打击地主豪绅;经济上限制富户,向他们重征“洪租”;在商业上在信宜城南门外创建新圩,实行轻税、互利的商业政策;同时注意发展手工业和农业生产。

陈金 在信宜重建“大洪国”后,为了巩固其政权,在军事上采取两大战略措施:第一、包围高州府城;第二、打击地方势力。

包围高州府方面,陈金 进行以下战役,对高州府造成包围之态势: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二日(1861年4月21日),陈金 派兵袭击茂西,大败乡勇团练于南塘;又急驰至茂北,攻威勇营,全歼清军。

咸丰十一年十月十八日(1861年11月20日),陈金 派部将刘超师出茂名,分兵下窥高州府城,疾驰至府城北关,令高州城内官绅惊恐万状。

同治元年正月初一日(1862年1月30日),屯驻青山青垌的陈金 军夜驰数十里,急出茂西境,凌晨,到达村心、沙田、顿梭等地,袭击从高州府城回乡过春节的绅士富户,震动高州城。

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陈金 派部将黎东九招新兵万余人,联合容县天地会众,出宝圩,入壶垌,达林陈堡,拟袭

击化州城，从西南面包围高州城，谋泄，不行动；急驰茂南，至沙坡，前哨战斗失利，即转攻打石鼓，又因前导被杀，乃退壶垌。

同治元年四月十四日（1862年5月15日），陈金派元帅郑金率军出茂名，迅速攻占了根子圩和分界圩，进军至电白羊角圩。十九日，与清军副将卓兴交战，失利，退守根子圩多日。

同治元年八月（1862年9月），郑金率军西驰至茂西南塘、壶垌，攻陷清军陈德先、黄国彪营，接着又攻下江背、山心、高麻一带清军营垒，清军死伤过半。高州城、化州城大为震惊。

同治元年十二月（1863年1月），郑金急行军至化州的中垌、官桥和石城（廉江）的新安、石角等地，沿途与清军、地方团勇作战，自那雾以下百里，到处是清军尸体。

以上战役，陈金先后从东、西、南、北四面进攻，构成对高州府城包围的态势，给清军极大威胁，吓得高州府城内人心惶惶，惊恐异常。

与此同时，陈金以很大军事力量打击地方势力。

被革职的信宜知县崇驻在信宜马贵堡，与当地豪绅勾结，招募团练；新任信宜知县黄德游与罗定统军侯勉忠合流，屯驻信宜云开村。这两股势力共同组成信宜地方武装力量，同清军一起构成云开——龙湾——马贵——石骨（茂名地）——高州城防线，与陈金抗衡。战争相当激烈，共进行了“石骨攻守战”，“钱排、龙湾争夺战”和“云开外围战”三场战役。

（一）石骨圩攻守战

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二日（1861年4月21日），陈金军在南塘得胜后，即急行军到茂北歼灭威勇营，分兵占据石骨圩。

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九日（1861年9月23日），清军副将潘其

泰率军 1800 余人攻下石骨圩，陈金 军退守东岸，待机再举。

同治元年二月初七日（1862 年 3 月 7 日）陈金 令能征善战的郑金和刘超围攻据守石骨圩的清军副将潘其泰营，激战两昼夜。潘其泰失败，突围溃逃。陈金 军收复石骨圩。

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二日（1862 年 9 月 15 日），陈金 令郑金率军东出石骨圩，进攻清军副将卓兴率领的 7000 人马，清军官兵死伤千余人，卓兴战败逃遁往谢鸡。

陈金 同清军双方都以石骨圩为争夺重点之一，是因为石骨圩是信宜城东面外围屏障；同时，石骨圩又是信宜云开、马贵通往高州府城的要冲，信宜流亡知县与高州府互通信息必经石骨地区。

（二）钱排、龙湾争夺战

咸丰十一年七月（1861 年 8 月），被革职的信宜知县崇 与豪绅李崇忠（马贵人）联合，到信宜新图地区（合水、新宝、平塘、思贺、钱排一带）发动捐资、募集练勇，由马贵、钱排出发进攻大洪国。

咸丰十一年八月十一日（1861 年 9 月 15 日），李崇忠邀集信宜新图各乡及罗定诸豪绅率练勇和所募集的新勇 3000 余人，分三路进攻大洪国，均被陈金 打败，练勇阵亡千余人。接着，陈金 军继破李时标堡，然后兵分两路，一路攻占林垌、北永，一路进攻马贵李、练两堡。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 年 1 月），新任信宜知县黄德游、罗定统军候勉忠从云开出击，攻占信宜沙底、龙湾。陈金 令郑金迎敌，大举反攻，迅速收复沙底、龙湾。黄德游、候勉忠急退云开。

陈金 与黄德游、候勉忠双方都是为争夺、控制云开——龙湾——马贵——石骨——高州府城这条通道。反复争夺，战斗十分激烈，地方势力伤亡惨重。

（三）云开外围战

云开村，居高临下，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俯控钱排——白石——洪冠——怀乡全线，远控东镇。新任知县黄德游以此为根据地。陈金 为铲除地方势力同清军联合占据信宜的据点，于是双方在云开周围开展了激战。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黄德游、候勉忠及新图各堡绅士，率兵勇进攻竹垌、翻稿、楼垌等处。陈金 将他们各个击破，收复上述各地之后，反攻云开，在走马坝、杀人坳激战，双方伤亡惨重，终因山高岭峻、路小崎岖，陈金 亦难于取得全胜。

咸丰十一年十二月（1862年1月），郑金在收复沙底、龙湾后，逼得黄德游、候勉忠退守云开，乘胜连破白石、榕垌、公和诸堡，斩杀地方豪绅及其党羽千余人。

至此，云开四面被围，所有交通道路都被陈金 军所截断（仅有人迹罕至的鸟道可往外地，但无法行军）。孤守云开的黄德游、候勉忠惶惶不可终日。但陈金 军要俘到他们，也决非易事。

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广东提督 寿赴高州督战，令被陈金 打败的清军潘其泰、方耀、卓兴等部集中力量进攻信宜。八月初二日（9月14日），陈金 的爱将高亮、麦贤遭受参将方耀、副将卓兴两军夹击，战斗惨酷。郑金按兵不动，坐视不援，以致高亮、麦贤阵亡。

郑金在信宜县城，称病不出，暗中派他的心腹陈瑞焘和甘文鉴与 寿联络， 寿准许他们立功自赎，郑金决定叛变降清。

同治二年九月初八日（1863年10月20日），郑金以研究军事名义，诱骗陈金到元帅府，伏杀了陈金，斩下首级，派陈瑞焘送到清参军方耀营寨。是月十五日，郑金率众投降，方耀进入信宜县城，大洪国遂告失败。

陈金领导的武装起义，是近代广东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咸丰十一年一月进入信宜县境，二月初四日（1861年3月27日）正式进驻信宜县城（今镇隆），以县城为大洪国首府，仍称南兴王，以学官（孔庙）为王宫。从此，信宜学官成为近代广东农民起义斗争的重要遗址——大洪国王府遗址。1983年为信宜县文物保护单位，1988年为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使信宜旧学官历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它与陈金的名字一起留存。

农民雕塑家、壁画家李南兴

陈启著

李南兴（1852~1926年），广东省信宜市钱排镇桥头屋村人，农民雕塑家、壁画家。

李南兴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只读过3年私塾。10多岁便拜当地巧匠李叶华为师，学泥塑、木雕、壁画艺术。20岁，学成出师，独自承包工程。

那时候，建筑工程有两种工：建造房屋框架的泥水工、木

匠工叫粗工；专搞雕塑、字画的叫细活。李南兴干的是细活，图状人物、山水，画花木鸟兽，泥塑或木雕人像，木雕画幅。他把《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和民间传说的故事、人物，组成一幅幅的画面，汇订成画册。征求工程主人的意见，然后按照不同的要求，雕塑成多种多样的人物、图画，或塑在瓦脊上，或雕在屋檐下，或画在墙壁间，或刻在梁檩上，构成雕梁画栋。

李南兴善于雕塑人像，他木雕或泥塑的观音、如来佛、关帝、文昌、盘古、伏羲、神农、洗太夫人、八仙等神像，都栩栩如生。他的壁画，擅长墨画鹰、燕、松鹤、松竹梅，千姿百态，独具一格。

李南兴每年承担的工程应接不暇。阳春、高州、罗定、信宜的合水、新堡、马贵等地，人们新建祠堂、庙宇，有钱人新营大厦，都争相聘请他去做细工。黄塘奇吟岭和合水雷公岭的盘古庙，马贵大庙，罗镜东山大庙等的画工，都出自他的手笔。现钱排镇桥头屋村的李樾公祠还颇为完好地保留着他的作品，计有：1、大门墙上壁画三幅：左是《三元及第》、右是《天姬送子》、中配《双凤朝阳》。2、庄口木雕四幅：左是《郭子仪祝寿》，上配《天姬送子》；右是《天官赐福》，上配《加官进爵》。3、前座走廊右边壁画二幅：墨画《八仙行乐》、《百燕图》。4、二座泥塑《庐陵王登殿》，又名《薛蛟薛葵招亲》。画面上有十几个人物塑像，可惜头像已被毁坏。

李南兴收有不少徒弟，其中陈七、李华、凌传扬、李守宏等，颇有成就和名气。

茂名地区出洋经商先驱陈铭盘

陈启著

陈铭盘（1867～1924年），原名陈树荣，同治六年（1867年）出生，信宜市怀乡镇平梅村人。陈铭盘是茂名地区出洋最早的先辈，是带资金出洋经商的先驱。为从家乡移居马来西亚（按，当时名马来亚，下同）之移民提供了食宿和汇兑的方便。他为信宜人移居马来西亚开了路。

陈铭盘兄弟6人，他排行第三，家庭原非富有。其父陈赞卿为佣工，后在怀乡墟开广昌店，手头逐步宽裕，才能送子弟上学。老大陈宠三因得饱读诗书，历任广西恩隆县、容县知县。陈铭盘刻意学习乃兄，奋志读书，早岁考上秀才，先后任琼州府教授、开建县训导。他觉得非商不能致富，乃改仕为商，在怀乡、东镇开“广昌号”，在镇隆开“埠生号”，还在梅菪、水东设店，沿线经营盐务。他得到家住广州的义母“朱先生”在资金等各方面的资助和鼓励。1890年后扩大经营，生意迅速蓬勃发展，除在南洋垦植橡胶园外，又开设广州“广德行”，香港“高发栈”，新加坡

“高发南”等商号，在吉隆坡苏丹街12号开设“高华客栈”，均经营旅业及包单回唐（为侨胞汇兑）。同时，他又筹集资金购买“信昌号”轮船，来往于水东、广州、香港、新加坡各埠，开辟高雷地区劳动力输往南洋的新渠道。特别困难的穷汉搭他的船，住他的店，在船上、店里开饭，可按力所能及先交部分费用或全部记账。到了马来亚，自由找工作，确实无法自找工作的，他又代为介绍或留在他的橡胶园工作，完全来去自由。这些人有了收入后，才逐步交付所欠各费。于是，穷苦乡亲才完全摆脱了“卖猪仔出洋”的枷锁。因此，他在侨胞中威信颇高，侨胞喜欢搭他的船，住他的店，喜欢到他的店汇款。他的生意蒸蒸日上。

那时候，不少人一旦飞黄腾达了，就夜郎自大，眼睛长到头顶上，瞧不起人。陈铭盘却不是这样。他回到家乡，不论穷富，都热情接待，娓娓交谈；披长袍的，穿布衣的，都像是老朋友，老幼妇孺都喜欢接近他。在广州，他的“广德行”门庭若市，是老乡的“大本营”，很多人在那里开饭、住宿。他又热心扶持青年，怀新中学第一、二任校长余登龙、余登麟在广州读书时，就曾经得到他的不少资助。对于家乡的公益事业，如扩建怀新学堂，开办信宜中学，修建桥梁、道路等，他也积极提倡，慷慨解囊。

“商场如战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鱼吃小鱼”的事普遍存在。陈铭盘一反此种歪风。在梅菪，他就力诫其经纪人：不能妨碍小商的发展，并要积极给予扶持。他每到梅菪，必检查这一条的执行情况。因而他的商店与同行们关系融洽。

因为他同各方面关系较好，后来当上了广东省参议员。

不料他“时运不齐，命途多舛”。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的轮船沉没，香港“高发祥”火灾，直接的损失与巨大的赔偿，使

他的商店全部倒闭，一蹶不振。

1923年冬，陈铭盘出任信宜县县长。他开始咯血，日渐严重。1924年5月21日（农历4月18日）病逝于家。

19世纪末，帝国主义经济大肆侵略中国，严重摧残中国民族资本。陈铭盘迎难而上，顶狂风，战恶浪，毅然在国内外发展民族企业，大大地方便了侨胞，其历史功绩不可没，他的风范使人敬仰。

民主革命宣传家李怀霜

陈启著 罗康宁

李怀霜（1874~1957年），原名李葭荣，字兼浦，又字怀江，号装愁庵，1910年改名怀霜，晚年自号不知老翁，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大路街人。他是国内有影响的作家、编辑和学者，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老会员，旧民主主义革命宣传家，曾主编《天铎报》和《珠江日刊》，著有《弢庵文存》一卷，《弢庵诗辑》三卷（已散佚）。

从清举人到反清斗士

1874年（清同治十三年），李怀霜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其家世代书香，祖父以上七代均是清朝贡生，高祖父李宜昌是清朝进士，父亲李逢臣在江西做官十余年，历任南城、峡江县丞，居正

八品。李怀霜幼年随父，生活于官舍。他聪敏好学，尤长于诗文。

1901年（清光绪二十七年），李怀霜中式举人第三名。中举之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及文化事业，他加入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写下章回长篇小说《炙蛾灯》等作品。他与晚清著名作家吴趼人（笔名“我佛山人”）交往甚深，吴趼人揭露封建社会的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出版时，他为之作了序。1909年，他与吴趼人、卢伟昌、郭健霄等在上海组织“两广同乡会”并创设“广志两等小学”。吴趼人逝世后不久（1909年），他写了《我佛山人传》，高度评价吴趼人的磊落气节和文学成就。文章结尾说：“君盖文章气节之士，虽或矫枉过正，而并世志士之摧残根本，自矜学植者，对之当有惭色。光明磊落如君，顾令不得志以终，非社会之咎而谁咎哉！”表明了自己对社会现实的不满。

孙中山组织中国同盟会后，李怀霜便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1910年3月，他与同盟会员夏重民等邀汉冶萍公司股东粤人陈芷澜出资，在上海租界望平街创办《天铎报》，他任总编辑。《天铎报》开始以商业性报纸的面目出现，不久便积极宣传民主革命，与于右任、宋教仁主办的《民立报》相呼应。成为同盟会在国内的两大喉舌。1911年清政府策划将中国的铁路权出卖给外国人，激起了全国有识之士的反对，掀起了一场“护路风潮”。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发表了青年文人陈布雷（后为蒋介石的近臣、幕僚人）致当时《中国新报》主编杨度的书信，抨击清政府出卖中国经济利益的行径。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帝国主义者却把军舰开进长江，企图干涉这场革命。当时在帝国主义势力很强的上海，许多报刊仍对武昌起义持反对态度，把革命军称作“逆军”；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则以《谈鄂》为

题，连续发表十篇时事评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武昌起义。这十篇评论连续刊出之后，不啻晨钟暮鼓之轰鸣，震聋发聩，大长了革命者的志气。刚刚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于民国元年（1912年）1月4日用英文写出《对外宣言》，派外交总长王宠惠专程从南京带到上海，交由李怀霜主编的《天铎报》译成中文，次日便在《天铎报》独家首先发表，顿时声震寰宇。这段时间，李怀霜还亲笔撰写了大量时事评论，为辛亥革命大造舆论。并与保皇党康有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批判康有为倒行逆施的言行。

坚持与封建军阀作斗争

1912年春，袁世凯上台，辛亥革命宣告失败。李怀霜继续以《天铎报》为阵地，刊登大量宣扬民主革命的文章，与袁世凯窃国的罪行作针锋相对的斗争。

袁世凯把屠刀伸向坚持民主革命的人士。1913年3月，国民党理事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李怀霜不怕风险，写下《宋钝初先生生讳并叙》，高度赞扬了宋教仁的业绩，表示了自己坚持革命的决心：“君骨可朽，吾头可断，此恨不遂泯也。”“先生往矣，国命如何？茸茸伊发，历历楚歌。吾种不忘，朽腐其芽。”激愤之情，溢于行间。袁世凯对李怀霜和《天铎报》的反袁言论又怕又恨，于1913年8月25日下令封禁了《天铎报》，李怀霜被迫亡命海外。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并亲任大元帅。为了从舆论上大力支持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当年冬，老同盟会员甄亮甫与军政府陆军部次长崔文藻出资创办《珠江日刊》，李怀霜出任总编辑，继续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出力。在他主持下，

《珠江日刊》积极宣传民主，揭露军阀。1918年4月，政学系头目李根源勾结桂系军阀莫荣新，排挤孙中山，囚禁了军政府陆军部长，杀害了陆军部次长崔文藻。李怀霜立即以《珠江日刊》为阵地，公开揭露这一阴谋，并将李根源劫夺地盘，把持税收的劣迹公之于众。李根源、莫荣新恼羞成怒，采取各种恶劣手段打击李怀霜及甄亮甫。甄亮甫见势不妙，秘密潜匿。在这种情况下，李怀霜只好停办《珠江日刊》，并冒着生命危险办好报社财产转让手续。

1929年，李怀霜任江西省政府秘书。陈济棠统治广东期间，李怀霜在第一集团军任少将主任秘书，这期间常为广州《民国日报》撰写评论。1935年，他前往西贡、星洲慰问华侨。在西贡到星洲的途中，他回顾辛亥革命以来二十多年的经历，想到当前的国难，无比感慨，于船上写下“九一八”四周年纪念日发西贡赴星洲诗：“新恨阗腔访昔游，巫风印俗上心头。敢夸异表云中鹤，未拟同情海上鸥。裂土存孤开国史，结金称叔慕臣谋。廿年前后兴亡话，付与天南一叶舟。”

以诗文自娱的暮年生活

抗日战争爆发后，李怀霜一度回到高州，曾在当地报纸发表抗日声明，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立场。1940年1月，他任广东省南路行署秘书。1942年1月，广东省主席李汉魂聘任他为广东省政府秘书，这时他已年过六旬，无心于政事，同时适逢母葬和女儿病逝，推迟到了3月底才偕夫人张剑影到设在韶关的省政府赴任。任职期间，终日以诗文自娱。李汉魂见此，便尽量减少他的事务，而给他的待遇十分优厚。他自己叙述这段时间的生活时说：

“几静窗明，薰风扇爽，山林幽邃，门禁威严，同僚以外，隔绝宾游，终日怡然，惟晤对孺人，或歌以自遣。”

但是，他仍未忘记国家与民族的危难，在他所作的不少诗文中，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忧国忧民之情，如在1943年春写的《吴逸志将军吊清臣曾国藩墓赋诗徵和却寄》诗十首，批判某些人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诗中写道：“急难釜中闻豆泣，缓归陌上见花开。绛侯无与安刘事，怊怅昭阳赤朋来。”“师岭幽宫闕睡师，虬髯论史到今疑。如何上国奇男子，不采风人御侮诗？”这些诗句写于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其反对内战，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表现得十分明显。

1946年，李怀霜到香港定居。1957年病逝于香港，终年83岁。

李怀霜一生著述甚多，但正如他自己所言：“清衣自惟，今日已觉昨日之非。明日未见今日之是。偶有所作，不经散佚，辄付摧烧。”所以他的著作多已散佚。同乡李卓立经过多方努力，才收到李怀霜的部分作品，编成《弢庵文存》一卷，《弢庵诗辑》三卷。惜亦荡然无存。现搜集到的仅有诗四十一首，文数篇。然而仅从这些诗文，便可看到李怀霜的造诣。他的诗被誉为：“随园之性情，愚叟之格调，阮亭之神韵，皆略兼赅。”如年青时作的《赋得水关红叶秋。得红字五言八韵》：“话旧逢今雨，江关琢句同。水遥蘋正白，秋老叶初红。远浦明孤鹭，疏林隐断虹。赋才萧瑟感，画意浅深融。艳衬清溪蓼，寒飘曲岸枫。鼓声官渡晚，灯晕客船风。几树苍茫外，双扉掩影中。飞卿工赠答，丽语入诗筒。”他的文，以严谨著称。如《经策》中的一段：“今天下位高官显之俦，读书谈道之士，持梁齿肥，悠悠自适；试叩以农政之得失，农学之精

粗，懵乎茫乎，不可识已。其甚者家绍世祿，言称先王，更鄙薄厌恶之，以为粪土之谋，学士大夫岂屑出此？呜呼谬哉！”除诗文之外，还与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合注宋词。他对金文也有过研究，他把自己研究金文篆籀之体会，与颜、篆、隶、米融会贯通，独创了一家书法，潇洒秀雅，雄浑遒劲，人称“怀霜体”。长江南北，有得其墨宝者，作珍品保存。

华侨企业家李季濂

陈启著

李季濂（1877～1936年），原名李锡贞，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大路街人。华侨企业家。

1877年5月6日，李季濂出生于书香世家，父亲李再荣，是一位学者。李季濂自幼受家庭熏陶，广读群书，学问大进，考试一举知名，诰授知政大夫，授五品銜委用训导，被派赴北方任职。后感于清朝时弊严重，辞职从商，结识孙中山先生，并加入同盟会，参与推翻帝制活动。辛亥革命后曾任广东省民政厅秘书、广州市政府顾问，1919年（民国8年）任广东省咨议局议员，后再度辞职从商。

20世纪20年代前后，不少农民前往南洋谋生，但法国占领

的广州湾（今湛江）出入境限制甚严，手续繁杂。李季濂向广州湾当局建议取消出入境限制，让人们自由进出，将它发展成为交通口岸。这一建议被广州湾当局采纳，并迅速付诸实施，信宜及高雷乡亲出国就业有了近路。为了减轻乡亲们赴南洋的旅费负担，李季濂又与船运公司联系，取得廉价船票；并在信宜镇隆、东镇及高州、广州湾、香港、新加坡、吉隆坡等地开设“锦纶泰”旅店，为往返南洋的乡亲做好沿途服务工作，旅费给予优惠；对部分特别困难交不起旅费的则由“锦纶泰”无息贷资，到南洋就业后再行分期偿还。仅1926年经“锦纶泰”旅店帮助前往南洋的信宜乡亲就达2万余人，被当地橡胶园和锡矿场争先雇用。后又广设“锦纶泰”商行，兼营汇兑业务。

当时的县城镇隆圩市场，是农副产品的集散地，人们赶集必经窦江木桥。窦江河阔水深，每年迭遭水患，冲毁木桥，当时的政府无力修葺，交通极为不便，百姓怨声四起。李季濂将镇隆“锦纶泰”商行的部分利润捐赠作为修桥费用，并添置渡船以备洪水泛滥时使用，聘请身强力壮善水性的村民负责守桥及撑渡船；又修建窦江茶亭，施以茶水，方便行人。

20世纪30年代初，李季濂为振兴祖国实业，集资港币数十万元，在广西南丹县大厂的深山野岭首创“利物锡矿公司”，受到广西省政府的热烈欢迎和大力协助。在探矿和筹建期间，李季濂曾坠马受伤，但他矢志不渝，艰辛创业。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建成初具规模的大型矿场，产品源源不断地经柳州、梧州水运出口。又在广西龙州探明一个水银矿场，但未来得及正式开采，这两个矿就被广西省政府接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领导广大矿工努力经营，使大厂锡矿发展很快，成为规模宏大

的“锡都”。

1935年冬，李季濂与女婿梁粤翘、内弟甘兼万前往大厂矿场召开公司董事会议。会后，顺道访广西省政府长官。李季濂离南宁返梧州途中，不幸因车祸受重伤，在南宁及香港医治无效，于1936年7月3日在香港逝世，终年59岁。

民国时期在经济建设有建树的

广东省主席林云陔

陈启著

1931年至1936年的广东，向来被公认为民国时代广东最安定的几年。这几年，广东省的经济建设有一定的发展。而这个时期担任广东省主席（即省长）的林云陔，为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

南路起义的组织领导者

林云陔（1883~1948年），原名林公竞，字毅为，广东省信宜市水口镇大垌官岸村人，1883年3月12日出生。少年丧母，跟姑丈入高州府海山书院攻读经史词章。1904年，林云陔与茂名县

谭惠泉等在高州组织“新高同志社”，从广州湾（今湛江）广购悬禁的革命书报，组织进步青年秘书阅读。后又与陆匡文等创办“雄辩学社”，组织青年学生阅读《革命军》、《黄帝魂》等书，宣传革命思想。这两个社团成为南路革命秘密活动中心。1906年考入两广方言高等学堂。在此期间，适遇朱执信由日本归国任该校教员，林云陔认识了朱执信，逐渐与之来往密切。不久，他加入中国同盟会，并在广州“长兴学舍”设秘密机关从事革命活动。当时秘密革命活动经费比较缺乏，林云陔多方设法筹借解决。1910年，林云陔参加了朱执信领导的庚戌新军起义，1911年3月29日又参加黄花岗起义，他在广州租双门底“詹同文笔店”后屋作起义储藏转运军械的机关，积极运输枪械弹药，供给起义军；朱执信在进攻广东督署时受伤，撤退到此处隐蔽和化装，翌晨由林云陔秘密护送撤出广州脱险。是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响应，林云陔奉命负责组织领导南路（高、雷、廉）起义重任。他先到香港领取军械，再由香港经江门赴高州。抵高州后，秘密汇集革命党骨干于“鸿渐馆”，分析形势，明确任务，决心誓死作战，务求起义成功。在林云陔的指挥下，兵分几路进行：一是秘密调民军防营黄元贞、张锦芳直迫高州城；二是由同盟会员林树巍率领信宜“选锋队”（敢死队）首先发难；三是策动新军干部投诚。做好这几方面工作之后，林云陔亲自率武装队伍攻入道台衙门，宣布反正（起义）。11月13日（农历九月廿三日）成立高州军政分府，林云陔被推举为分都督，接着他以都督名义敦促南路各县革命党人继续讨伐清兵，从而使南路局势日趋稳定。不久，林云陔调任广东省都督秘书。

致力于经济工作

1912年，林云陔被孙中山派赴美国纽约舍利乔斯大学学习法律政治，获硕士学位。1919年，他从美国回来，随孙中山在上海，任孙中山秘书，并兼任《建设》杂志撰述。他将孙中山《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英文稿译成中文，从此便把精力转向经济工作。

1920年，林云陔随孙中山回广东，先任登记局长，接着改任大元帅府秘书兼广东省教育会编译处主任。不久孙中山率师北伐，他随师到当时设在广西桂林的大本营。任大本营金库长兼广西省银行行长，负责军需供给。在经济来源缺乏的情况下，他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保证北伐顺利进行。1922年，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立即命令北伐军回师讨伐陈炯明叛军，林云陔随北伐军步行回广东。这时军需供应遇到困难，他奉孙中山之命，赶往香港筹饷，经多方努力，迅速将款筹到带回，派陆幼刚送到前线，为平息叛乱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3年2月8日，林云陔任广州市市长，1924年之后，又先后改任广东省审判厅厅长、检察厅检察长、中国国民党广东南路督导、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1927年5月20日再次任广州市市长（当时称市政委员长）；1928年1月7日第三次任广州市市长。三次担任市长的时间共4年多，林云陔却施展了他在经济建设上本领，作出了不少建树，如市银行和市医院之创立，海珠桥之架设，海珠新堤（今沿江路）及内河港之建筑，自动电话之装置，自来水、电灯之改良，广州市马路之扩展，地下排水道之修浚，中山图书馆之增设，均为林云陔在任期间陆续完成的。

出任广东省主席以后

1931年，陈济棠控制了广东，为了稳定局势，邀林云陔出任省主席。林云陔欣然接受，于6月就职。1932年夏，兼任建设厅厅长。此后五年间，广东省政治比较安定，使林云陔能着手进行一系列经济建设。

1932年10月，他根据广东省实际，于一个月内写好《广东三年施政计划建设事项述要》和《建设厅三年建设计划纲要》。

为了保证计划的彻底执行，林云陔把领导权紧握在省政府和建设厅手中，经常到第一线巡视，调查研究，及时地就地解决问题。在实施过程中对既定计划加以合理的补充、修改和发展。原来，“三年计划”没有明确提出省办糖厂，后来只用两年时间，全省就建成了顺德、番禺、东莞、惠阳、揭阳等榨量达1500吨以上的制糖厂7个，并附设有酒精厂。糖厂遂成为广东省政府的“摇钱树”。

广东筹设工厂的固定资金需要1亿元。林云陔采取灵活的措施筹措：以厂养厂，靠士敏土厂和糖厂的利润建成一批新厂；将民办公路段行车权让出数年，得款兴筑桥涵路基；积极引进侨资；利用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择优选取外国机械；维护银行的信用与发挥银行的作用；“以地方之力发地方之利”，计划完成的38个公路路段，由地方负责筹筑了22个路段。他精简机构，裁员减薪，整顿收支，又筹措了大笔资金。

林云陔说：“建设端赖人才。”他聘请了30多名外国专家；经过考试，甚至亲自考核，录用了一批在野人才；尽可能聘用留学归来的有识之士；尤重自己培养人才，除派遣技术人员出国深造、办训练班外，创办了勤大学、工业专科学校，筹办航海学校和讲习所，设立农业和职业学校等。与此同时，林云陔运用行政手

段和经济措施，保护新兴的实业。广东省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林云陔大力发展水泥、造纸、纺织、饮料、玻璃和电力等工业。他运用以厂养厂的办法，首先经营好水泥厂，以水泥厂之盈利兴办糖厂，又以糖厂之盈利再办纺织厂，复以水泥厂、糖厂之盈利办造纸厂、化肥厂、汽水厂、啤酒厂、硫酸厂、麻包厂等 28 间工厂，固定资金 5060 万元；带动民营企业从几百家发展到 2000 余家，总资产从 650 万元发展到 1500 万元。1935 年底，广东全省兴筑公路 4000 多公里；1936 年底，建成粤汉铁路，广州市修筑马路总长 134 公里，长途电话 3.3 万余里，发展了航运。不到三年时间，广东省建设厅工业资金由 5 万元骤增至 7000 万元。仅广州、潮汕、惠阳所产白糖即挽回外溢 3000 万元。还带动了其他事业的兴旺发展。创出了一批科技成果。

林云陔着重抓工业、交通发展的同时，对广东省其他建设事业也很重视，例如中山纪念堂的修建，全省公路干线的修筑，罗浮公园的开辟，飞机场的扩建，石牌中山大学新校舍的兴建等，都是他在任时期完成的。林云陔的这些政绩，赢得了广泛的好评。

林云陔的这些建树，给国计民生带来了不少好处。1936 年，陈济棠在国难严重关头准备发动内战，于是林云陔便与陈济棠分道扬镳，离开广东省府，8 月，调任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常委，兼中央审计部部长（后改为审计长）。此后 12 年，他一直主持审计部工作。在他的主持下，审计部政绩名列民国中央各直属党政机关第一名，他也被誉为“谋国忠勇，治事勤奋，廉正楷模”，并被誉为了“模范部长”。他的夫人陆景贤随他一起生活，亲自操持家务，洗衣做饭，如普通居民一样，这在当时也传为美谈。

1948 年 10 月 7 日，林云陔病逝于南京，享年 65 岁。

保卫孙中山脱险的总统府特务长陆志云

陈启著

陆志云（1883~1943年），广东省信宜市水口镇水口村人。中国同盟会会员，孙中山身边重要工作人员之一。

陆志云，青年时就读于高州高郡学堂，获识县人林云陔、李卓立和茂名人谭惠泉、熊英等，结成进步团体“新高同志社”，秘密组织青年学习进步刊物，传播革命思想，并先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3月29日，广州“黄花岗之役”失败后，陆志云奉命与同盟会会员梁卫平、梁禹平、陆师歧等前赴广州湾（今湛江）近郊农村，发动民众，组织民军，筹集枪枝弹药。同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同盟会会员林云陔奉命领导高州起义，陆志云带领武装队伍从广州湾郊区向高州挺进，与各地军民一起，

于同年11月13日抵达高州城。高州起义宣告成功。

1914年至1916年的讨袁（世凯）驱龙（济光）战争中，陆志云奉孙中山之命，先后赴信宜、广州湾等地，动员民众，组织军队，投入斗争。

1921年，孙中山在广东建立中华民国政府，就任大总统。陆志云任孙中山的特务长（相当于侍卫长），负责孙中山和总统府的安全保卫工作。

1922年，平定粤桂两省之后，孙中山举师北伐，陆志云任北伐军辎重队队长。

正在北伐军步步推进之际，担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大本营陆军总长、内政总长的陈炯明，暗中破坏北伐。6月13日，竟密令叶举部占领广州东、西、北郊各战略要地，准备公开叛乱，炮轰总统府，妄图杀害孙中山。是月15日夜，粤军陈德春部连长赖达（信宜人）获悉陈炯明叛变之手令，潜出营地，向陆志云和林树巍报告。陆志云立即和林树巍、林直勉奔至粤秀楼，向孙中山报告了陈炯明的这一情况。陆志云说：“我有个在陈德春部当连长的同乡赖达，向我报告说，陈军在今晚深夜三时开始攻击总统府，口号是‘食饱饭，杀民贼’。这个消息十分确切，情势很险恶。请大总统速往别处，暂时避开。”孙中山听后，说：“竟存（陈炯明）纵然恶劣，料不至此。即使竟存不轨之谋，但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和我久共患难，岂肯尽听竟存之命？请各位无须过虑。”到深夜1时，陆志云等三人又往粤秀楼，劝说孙中山速离此地，并拿出白夏布长衫给孙中山披上，由小路步行撤离。途中两次遇到陈炯明军队，四人从容镇定，都机智地通过，直到海珠海军总司令部。

1924年1月28日，陆志云任香安局局长（两广盐运使所属）。他遵照大总统孙中山的部署，深入调查研究，迅速查明情况，秉公执法，对前任局长梅放洲营私舞弊、违法乱纪的腐败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作了严肃处理，受到孙中山赞誉和广大群众的拥护。

1924年7月8日，陆志云奉孙中山之命出任广东电话总局局长。他雷厉风行地整顿松、散、乱的作风，制订和健全规章制度，并报请孙中山批准，通令各总司令、各军长及其所属官兵，一律要遵守、执行广东省电话局新订的规章制度。电话系统的面貌为之一新。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陆志云改任广东省封川县县长。1929年，孙中山遗体安葬于南京中山陵，陆志云被邀请参加了奉安典礼。从此，他辞去一切军政职务，在广州居住。1930年发起创办广州自然汽（沼气）公司，经试验成功，但因经费不足，公司未能发展。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即回家乡居住。1943年因病逝世，终年60岁。

勳勤大学校长陆嗣曾

陈启著

陆嗣曾（1888～1956年），字光宇，号定庵，信宜市水口镇

水口村人。清末，考入高州中学堂肄业。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他与林云陔考上广州两广方言高等学堂，师事朱执信，加入同盟会，设机关于“长兴学舍”，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宣统三年（1911年），他与林云陔租双门底詹同文笔店后屋作机关，作转运军械之所。三月二十九日，朱执信攻督署受伤，战至双门底，弹尽遇强敌，避入其间，疗伤易服，由林云陔护送脱险，陆嗣曾留寓应变。是年九月初四日（10月25日），陆嗣曾奉命协助林云陔回高州领导起义。林云陔率队攻入高州道台衙门，成立高州军政分府，陆嗣曾任参议。民国元年（1912年），陆嗣曾族叔陆耀文任番禺县县长，他随任幕僚，为县长草订重要文告、计划。不久，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肄业，适举行文官考试，他应考合格，分发外交部签事室行走。毕业后，任广州航政局局长。民国9年（1920年）任广州地方检察厅检察长。孙中山于民国12年（1923年）3月建立大元帅大本营，广东省政府也随之建立，陆嗣曾任地方审判厅厅长，兼大本营法制委员会委员，提请拟宪法纲要及修订民刑法案。不久，调南京，任行政院参事，专司有关法制的审查、拟订等事项。民国20年（1931年冬），任广东高等法院院长，兼管最高法院第四分庭事宜。民国22年（1933年），任广东省立勸勤大学副校长，负责学校实际工作，旋升任校长，兼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监察委员。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广东，陆嗣曾先后两次迁校信宜，在抗日战争艰难岁月，而勸大弦歌不辍。民国32年（1943年），他兼任广东省参议员。民国34年（1945年），勸勤大学迁回广州，陆嗣曾乘时告退。在家建“退修堂”隐居，他说：“得许退修弭晚节，征帆好趁顺风收。”民国35年（1946年）任国大代表。

陆嗣曾雅好吟咏。在广州，他经常参加 园的文酒之会。与陈融、林云陔、谭惠泉、熊英、冒鹤亭、陈石遗等颇多唱和。他有诗集《定园遗诗稿》，未刊。

1949年，陆嗣曾移居澳门。国民党司法院邀他往台北任职，他以体弱辞却不就。1956年病逝，得友好族戚赠资成殓。

“服务最有恒心的教育家”林砺儒

陈启著 罗康宁

林砺儒（1889～1977年），原名林绳直，广东省信宜市北界镇上村人，我国著名的教育家。

立志教育

1889年7月18日，林砺儒降生于广东省信宜市的一个书香世家。他四岁丧父，母亲患癫痫病，从小靠祖母抚养。伯父林鸿和叔父林适对他特别疼爱，严格教养。林鸿出身廩生，“好学力行，乐育子弟”，且“颇有林泉志”，宣统即位改元时，诏举孝廉方正，县里要选拔他，他却之不受。林适是砺儒父亲的孪生兄弟，出身

优贡，并进过广雅书院就读，后以教书为业，常携侄儿于身边，口讲指划，耳提面命，诲而不倦。这一切对林砺儒后来的“立身治事”影响很大。这位叔父十分热爱自己的职业，时时吟诵孟子之语：“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在伯父叔父的引导下，林砺儒渐渐树立了不走读书做官之路而服务教育的志向。

自1862年（清同治元年）设京师同文馆开始，“教育救国”成为官场和士林中一些人的热门话题；清政府于1902年和1903年相继颁布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之后，这一热门话题也就更为热门了。1905年，林砺儒进高州高郡中学堂读书，这正是按“教育救国”论者的主张而设立起来的学堂。他学习十分勤奋，各种各样的书都读，曾积劳成疾吐过几次血。1911年，他以优异成绩毕业，即应信宜县中义学堂（今信宜中学的前身）之聘到该校任教，同年又参加公费留学日本的考试，选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抱定了终身服务教育决心。

然而，就在他留学日本的岁月里，祖国大地发生了种种变化，这些变化，用他后来的话概括，便是：“改制崩溃，产业崩溃，信仰崩溃，学问思想、社会组织，无一不崩溃。换句话说，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背景——都在崩溃。”他已经感到：“想只凭学校教育的力量去改造它自身的背景，恐怕是不可能！”那么，自己“服务教育”的志向还应不应继续坚持？

怀着迷惘的心情，在回国的第二年，他还是登上了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的讲台，担任心理学和教育课程。而就在这一年，“五四”运动爆发了。民主与科学的浪潮，冲刷着古老的神州，也冲刷着他的头脑。他支持学生运动，帮助学生办平民学校，办识字班。在实践中，他重新看到了教育

的作用，对教育有了新的认识。他对学生说：“教育家要培养进步的人格，以适应进步的社会！”

初试霜刃

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前身为北京五城学堂，是我国最早的一所公立中学。成为高师附之中之后，本应“更有条件负起中学教育开路先锋的重任”，然而由于领导思想守旧，问题很多，师生意见很大，经常发生学潮，以致成为少有人敢问津的地方。为了整顿附中，办好附中，北京高师负责人拟派林砺儒兼任附中主任（即校长）。

消息付出，不少人为他担心，有人还当面警告说：“当附中主任，等于上断头台！”

林砺儒却欣然接受了这个冒大风险的使命。“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他要到附中去实施自己的改革主张，试一试“霜刃”。

1922年9月，林砺儒正式就职。在就职演说中，他指出：“中学教育是全人格教育，其基本任务是文化教育，是人们需要的普通文化修养的最高水平。”他的话，语不惊人，却象一股清新的和风，吹进师生的心腑。

他改革的第一步棋，是试行“六三三”学制，将原来小学七年、中学四年改为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林砺儒提倡和实践这种学制在我国已经实行80多年，至今还实行这种学制）。为了适应新学制，他组织教员制订规章制度和教学计划，编写教材，自己草拟，自己试行，自己修订，因而形成了一种勇敢负责的风气。

有了新的规章制度，他便开始对校风学风进行全整顿，提

倡“师生互相亲爱，互相协助”。针对过去教育脱离实际的做法，他提出教育应以生活为主，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并重视给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在高中增设了第二外国语、解析几何、微积分初步、初等力学、电磁学、分析化学等课程，同时，展开全校普及体育。此外，还聘任了一批有学识、有改革精神的新教员。

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高师附中风气好转，质量提高，成为一所全国仰慕的学校。学生以附中为荣，家长以子弟能进附中学习为幸事，许多人还多方拜托，请人说情，务期进入附中读书。而在这时，便有人谋取附中主任的职位了。有个家伙多方钻营，终于谋到了委任状，却又不肯贸然赴任，只得厚着脸去找林砺儒。

林砺儒早有思想准备，坦然地说：“既已如此，你就即刻来接吧！”

附中广大师生闻讯，无比气愤，准备罢课抗议高师的这一决定。林砺儒反复劝阻，终于感动了师生，没有闹成风潮。

1928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入北平大学，改称第一师范学院，林砺儒任临时院务委员会主席。他便着手对第一师范学院进行改革，增设了社会系，支持师生参加社会上的进步活动。他的这些做法不为当局所容忍，到1931年，国民党教育部决定对第一师范学校严加整顿，停止招生一年，并解除了林砺儒的职务，派来了新院长。林砺儒愤然离开第一师范学院，南下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授兼教务长，不久又兼任广州师范学校校长。

点燃明灯

1933年，广东省政府为纪念古应芬（字勤），创办勤大

学，林砺儒应邀参加筹办工作。该大学成立后，他出任教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1937年，勤大学教育学院独立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他继续担任院长，于是以这间学院为基地，更放手地进行教育改革。

为了“培养进步的人格”，林砺儒在课程设置上打破常规，增添了一批公共必修课，如“新哲学”“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说史”“国际政治”“世界革命史”等；先后聘请了一批进步教授，如张栗原、蒋径三、李平心、高觉敷、陈守实等到校执教，还邀请著名民主人士邹韬奋、钱俊瑞、杨东莼等到校作形势报告。他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学生可以组织各种社团，探讨各种问题。他还带领师生下乡进行抗日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国民党当局对林砺儒的做法十分不满，派员到校寻衅，指责教育学院不应开设“新哲学”、“国际政治”等课程。林砺儒便将校名改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将“新哲学”改为“教育哲学”，内容不变，原有的系科和教员全部保留。国民党当局又派员到校，要设立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分部，林砺儒便和进步教师商定，由一位教授兼任训导主任和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并挂上训导处和国民党区分部的牌子，实际上没有开展什么活动，使国民党当局无法直接插手学校的工作。

1941年初夏，林砺儒在广东文理学院已经奋斗了整整八年。回顾八年的历程，看着学院的兴旺景象，他无比兴奋，又无限感慨。如今，这所学院已被誉为“教育界的明灯”，然而，明灯愈亮，风吹愈烈，这盏灯会不会被吹灭？不管怎样，自己探索真理之光的决心不改，播种文化食粮的壮志不渝！想到这里，他奋笔写下一首《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校歌》歌词：

民族抗战的烈火，
炼出我们这支青年军。
走遍了险阻，历尽了艰辛，
却淬砺了奋斗精神。
我们要探索真理之光，
我们要广播文化食粮，
那怕魔高十尺，恶战千场。
同学们，挺起胸膛，放大眼光。
这是我们的校风，
这是我们的英勇！
同学们，挺起胸膛，放大眼光，
这是我们的校风，
这是我们的英勇！

“挽林”学潮

就在林砺儒写下《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歌》不久，校园上空，阴云密布，国民党反动派终于伸出了魔爪。

一天，张栗原教授象往常一样登上讲台，开始授课。这时，一名学生竟将左轮手枪摆在课桌上，对张教授进行威胁。顿时，课堂秩序大乱。这件事立即引起林砺儒的警觉，他意识到这是有来头的，这名“学生”肯定是国民党反动派派来的特务！于是，他一面组织力量保护张栗原教授，一面密切注视动向。

1941年5月，国民党当局终于下令，改组文理学院，免去林砺儒的职务。

教师震怒了！学生震怒了！文理学院掀起轩然大波！

师生们自发成立了“挽林委员会”，召开声势浩大的“挽林”大会，派出教师代表团前往韶关向广东省政府请愿，并通电全国，要求收回成命。学生们还集体创作了《挽林战歌》：

风已来了，雨也来了！
我们学校的风雨中飘摇，
我们的生活在风雨中震荡。
我亲爱的同学们，团结起来！
我们的生活在风雨中震荡。
我亲爱的同学们，团结起来！
挺起我们的胸膛，
放大我们的眼光，
我们坚决挽留林院长！
林院长是教育界的明灯，
林院长是青年们的保姆，
八个年头，一贯作风，
探索真理，追求光明。
我亲爱的同学们，团结起来！
挺起我们的胸膛，
放大我们的眼光，
我们坚决挽留林院长！

这首歌和林砺儒作词的校歌，此起彼落，互相交织，响彻校园。

面对这场学潮，国民党反动派十分恐慌，派去接替林砺儒职务的人也不敢上任。当局便采取高压政策，逮捕、开除了不少

学生。但师生们毫不畏惧，坚持斗争达两个多月。

最后，国民党当局决定，由教育厅厅长黄麟书兼任文理学院院长。

林砺儒被迫离开倾注过无数心血的文理学院。然而，他那“探索真理，追求光明”的精神，永远留在师生们的心中。

桂林笔耕

1941年10月，林砺儒来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担任广西教育研究所导师；次年4月，改任国立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长。他自知已受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密切注意，不能不防他一手。于是，在家门口贴上一副“读书幸未成君子，学圃犹堪作小人”的对联，以著书立说的方式，继续宣传教育改革的主张。

从1941年到1945年，他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怎样做中学校长》《精神剃须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教育》《五四运动的评价》《八·二七路线》《儿童保育与人性改造》《养士》等。在《精神剃须论》中，他指出：指导青年，“一不是靠权威部勒，二不是凭笼络操纵”，而必须了解青年，和他们做真诚的朋友，共同参加社会实践。这篇文章在《文化杂志》刊登后，刺痛了国民党当局某些人，致使《文化杂志》被迫停刊。在《八·二七路线》中，他继续宣扬学术自由，求真理，明是非，认为学生要尊师，但对教师的学说、教义可以怀疑批判。他的这些言论，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满，特务多次用匿名信对他进行恐吓，但他置之不理。1944年，他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多年来的实践，写成《教育哲学》一书。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大搞独裁，发动内战。林砺儒再也

坐不住了，投身到民主运动中去。1946年，他不顾国民党特务恐吓，毅然加入民主同盟。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控制桂林师范学院，决定迁校南宁，并撤换了院长，林砺儒愤然辞职。这时，他身患肾炎，便回广州治病，由于生活贫困，连盘尼西林也买不起。桂林师范学院张毕来教授等获悉，立即凑了一笔钱寄给他。他接到钱，回信说：“庄子有云：‘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诸君盛情可感，亦复可哀，不如相忘于江湖。”有人将此信贴于学院布告栏，引得许多师生热泪盈眶。

改革不止

林砺儒早年便打定主意不做官，也不涉足政界。在北京任教时，曾有两三个省先后邀请他出任教育厅厅长，都被谢绝。自1918年至1949年，他一直在大学任教，在从事大学行政工作期间，均坚持授课，被誉为“服务最有恒心的教育家”。

1949年夏，中共中央邀请他赴北平（北京），他则欣然接受，离开厦门大学，取道香港到达解放后的北平。他参加了1949年秋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以中华全国教育工作者代表筹备委员会委员发言。当选为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林砺儒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北京师范大学校长，并讲授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等教育研究。1952年任教育部副部长。

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教育事业，他以忘我的精神投入工作，先后主持起草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师范学校暂行规程》草案，并就少年儿童教育、中学教育、民族教育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写下《中等教育的两个问题》《了解少年儿童是教

育工作的先决条件》《教因材施，材也由教成》《社会转形期中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等论文。在《社会转形期中等教育的任务是什么？》一文中说：“新中国成立后，教育要加强已经存在的政治条件，又配合着争取现代化工业的经济条件。要培养大批有身手，而又有革命头脑的生产者。对于各级学校，推行义务教育小学外，应加以调整整顿。”提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办好教育的主张。

1954年，林砺儒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连续当选为第二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61年，年逾古稀的林砺儒患食道癌刚愈，便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吉林，就师范学校的学制及教学计划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963年，他连续参加了天津中小学办学经验座谈会和云南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后又深入云南、广西等地调查研究教育工作的课题。在这段时间，他还撰写了《师范教育问题随笔》《语文教师是经师，也是人师》《怎样对待学校考试》等文，提出不少新见解。如在《怎样对待学校考试》中，他指出：“人生遇事要做，遇问题就要解决，所凭借的只是自己所有的知识才能。人生正是这样活到老、学到老、考到老至死方休的过程，原非可怕。怕考试几乎等于怕生活，从来未闻有人怕生活的，而学校的学生则大多数怕考试，其原因何在，值得深思。跃跃欲试，原是有勇者的常情，而学校竟把考试变成学生的畏途，其故安在？为人师者应深自反省。”

可惜的是，由于当时“左”的倾向越来越严重，不久便爆发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林砺儒的这些探讨未能继续进行下去，他的许多正确主张也无从实行。

江青反党集团被粉碎后，林砺儒看到了我国教育事业的光明

前景。然而，他已经重病在床，再也无法为之而奋斗了……

1977年1月20日，这位杰出的教育家，教育改革的先驱，广大青年学生衷心爱戴的导师，因患胃癌，抢救无效，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88岁。

林砺儒逝世后，家人捡点遗篋，发现他于1973年在笔记本上写下的一副“自挽联”：

服官自笑立仗马

遗稿尚无封禅诗

他的儿子林颖夫将这副“自挽联”拿给叶圣陶看，叶老感慨地说：“恰如其人！”

救护孙中山脱险的总统府参军林树巍

陈启著 罗康宁

1922年6月15日夜，广州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事件：当时担任广东省省长、粤军总司令、大本营陆军总长、内政总长的陈炯明，公开发动叛乱，炮击总统府，妄图杀害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身边的三名工作人员冒死护救，使他脱险。总统府参军林树巍，便是护救孙中山的三名工作人员之一。

辛亥革命的坚强战士

林树巍（1889～1949年），字拯民，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荔枝村人。1889年11月出生。青少年时喜欢武术枪法，曾跟武术师傅“沙朗二”学习多年。清末考上广东虎门军校肄业，后加入同盟会。1910年，参加朱执信领导的庚戌新军起义。起义失败后回信宜与同盟会员陆匡文秘密设立中国同盟会南方支部信宜分部，积极发展同盟会员，入会者颇为踊跃。1911年3月29日，林树巍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没有动摇，又回信宜筹集枪枝弹药，力图再举。清朝粤督军张鸣岐鉴于新军起义与黄花岗起义两次教训，害怕新军再次起义，又怕土匪参加革命队伍，乃调动新军远离省会进行剿匪，遣协办参谋黄士龙率二标新军到信宜进行清乡剿匪。这时，林树巍正准备再组织新军举行起义，因黄士龙到来而未能成功。于是，用钱买通一个理发匠计划进行杀黄士龙，不料理发匠临场惊慌失常，致使计划未能实现。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1911年10月，林云陔奉命赴高雷领导起义，林树巍全力支持林云陔，他同信宜人、同盟会员甘熙初、陆耀文等，在信宜团防局挑选组织了一支选锋队（敢死队），率领他们首先发难，打响高雷起义第一枪，由信宜出师向高州挺进。在林树巍带头起义的影响下，高雷部分新军和民军配合他所率领的选锋队，从四面八方包围高州城，使高雷起义很快成功。

由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妄图称帝，辛亥革命遭受挫折。1913年之后，林树巍投入了讨袁（袁世凯）驱龙（龙济光）的斗争。当时朱执信负责广东军事领导工作，林树巍奉朱执信之命，由高雷两阳四邑司令改任高雷总司令，专事负责高雷地区讨袁驱龙任务。正在军事行动紧急关头，高雷道尹王典章突然从内部作乱，他秘密照会广州湾（今湛江）法国租界当局，借法国人之手

把林树巍、林直勉、薛岳、梁卫平、梁树熊等八人逮捕起来，企图杀掉，后孙中山知道了这一情况，立即致电法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才把林树巍等押解往越南河内囚禁，不久获释放。1916年春，高雷讨袁北伐军基干队伍组成数千人，时林树巍改任北伐军经理局长，负责购运军械、粮饷的筹集调运工作，不久袁世凯突然病死，部队奉孙中山之命，停止北伐，就地驻防训练。后林树巍改任总统府参军。

冒死护救孙中山脱险

正当孙中山挥师北伐的时候，当时担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大本营陆军总长、内政总长的陈炯明，暗地里与北洋军阀吴佩孚、曹锟相勾结，并和湖南省长赵恒惕搞“联省自治”，处处给孙中山制肘。先则令所部粤军五十营从广西搬兵回粤；继则以辞去本兼各职为要挟，迫使孙中山放弃北伐。叛逆之心，日益暴露。

孙中山于1922年6月1日毅然从北伐前线韶关回到广州，并以诚相见，教育陈炯明要以革命事业为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但陈炯明叛变之意已决。竟于6月13日密令叶举部占领广州东、西、北郊各战略要地，阴谋发动叛乱，妄图杀害孙中山。林树巍和林直勉、陆志云会集于广州东横街梁辛尝（信宜人，老同盟会员，原高州分府民政长）医院，交换情报，研究局势，确悉军情十分紧急，是月15日夜，粤军陈德春部连长赖达（信宜人，老同盟会员）获悉陈炯明叛变之手令，秘密潜出营地，直接向林树巍和陆志云报告紧急军情。赖达说：“驻黄沙粤军已向北开动，陈德春命所部第一团守护沙面，第二团联络李元复部，向观音山攻击

前进；驻高州会馆之熊略部则开往财厅前。”林树巍和林直勉、陆志云迅速奔总统府向孙中山报告了陈炯明正紧急调集部队，发动叛变的行动情况。孙中山听后说：“兢存（陈炯明）纵然恶劣，料不至此。即使兢存有不轨之谋，但他的部下有不少是明理正直的人，他们很多和我久共患难，岂肯尽听兢存之命？请各位无须过虑。”林树巍说：“粤军（指陈炯明）素来野蛮，不能不防备。”劝孙中山离开粤秀楼，但孙中山不肯离开。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三人只好退出。到了当晚深夜一时，事态越来越紧急，林树巍等三人又急速跑去见孙中山，再三力劝孙中山立即离开粤秀楼，在千钧一发之际，林树巍等三人即拿白夏布长衫给孙中山披上，用力挽着孙中山离开粤秀楼，步行由小路到达德宣路，即见有很多陈炯明部队向总统府进发。当走到惠爱路，正要横过马路入桂香街时，被陈炯明叛军的哨兵拦阻，不准通过。哨兵盘问：“往何处去？干什么的？！”林指着孙中山对哨兵说：“我的母亲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请来这位医生到家里诊治。”但他们仍不许通过。林又说：“我们住在高第街，你们如若不信，就请一齐和我们到家里看看。”哨兵看见孙中山穿了一件白夏布长衫，戴一副墨晶眼镜，十足象个医生，就让孙中山等通过了。当林树巍护送孙中山到靖海路时，又遇到陈炯明叛军，孙中山及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态度从容镇定，叛军没有怀疑，便安然通过。从此一直沿长堤走到岸边，雇小艇渡江往海珠海军总司令部，海军哨兵喝问，林树巍说是有重要公文必须交温总司令（温树德），温树德出来，见是孙中山，便请同登楚豫舰。此时，炮声四起，陈炯明叛军洪兆麟部四千余人于16日凌晨三时左右，围攻总统府，炮轰粤秀楼。但孙中山已安全脱险，转危为安。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自香港回广州，在广东省政府接见各界人士时，当面问邓泽如：“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等，现在何处？”并嘱邓泽如即电召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来见他。可见他念念不忘林树巍等三人护救之功。

出任高雷讨贼军总司令之后

孙中山脱险之后，立即指挥部队讨伐陈炯明。1922年冬，林树巍出任高雷讨贼军总司令，从广州出发，驰赴高雷，兴师讨贼，激战数月，把陈炯明余部胡汉卿所部数千匪兵打败，使高雷地区恢复和平。接着于1923年2月他兼任高雷绥靖处处长。是年12月，桂系军阀陆荣廷部属申保藩侵犯化州、廉江，林树巍率师征剿，申敌败退钦州。

1924年春，陈炯明残部邓本殷、吕春荣等联合以万余之众，极尽全力进犯高雷。林树巍在内无储粮，外无接济的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奋力抵抗，死守弥月，终因饷绝弹缺，战事失利。他的部队改编为西路讨贼军第五师，他任师长，继续于高雷、两阳、四邑坚持讨贼作战。1924年10月22日，奉孙中山之命，回广州于大本营效力。翌年，孙中山逝世后，林树巍辞去所任职务，到香港居住。

1931年唐绍仪任中山县长时，林树巍从香港回中山县任公安局长，不久又到香港，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之后，于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汪精卫汉奸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长、大汉奸林柏生由南京赴香港，以兄弟叔侄的关系劝说林树巍出任香港维持会长。林树巍拍案而起，大骂林柏生当汉奸，出卖民族和国家，有辱祖宗，指着林柏生的鼻子说：“你是林氏的败类，是信宜人的

败类，是中华民族的败类！”遂扬长而去。日军驻香港司令矢崎指名要林树巍当香港维持会长。林树巍断然拒绝，并迅速秘密离开香港，回信宜县镇隆镇荔枝村定居。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林树巍任信宜县参议会议长。1949年11月29日病逝于信宜县镇隆镇荔枝村，终年六十岁。

林树巍长期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是孙中山身边的重要参谋人员，为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是冒死护救孙中山脱险，在中国民主革命史写下不可磨灭的一页。

代理广东省主席、中将文官陆幼刚

陈启著

陆幼刚（1892～1983年），号励庵，广东省信宜市水口镇水口村人。曾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广东省政府秘书长、代理广东省主席，广州市参议会议长。

陆幼刚出生于1892年。少年丧父。稍长，到广州读书，加入同盟会，与林云陔等秘密从事民主革命活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他随林云陔到香港提取武器，取道江门返高

州，参加了高州起义。民国成立后，即进北京大学攻读文科，毕业后回广州。袁世凯盗国，他通电声讨。后赴日本，与孙中山相会，并服务于孙中山左右。不久，随孙中山归国，参加讨袁。1921年冬，孙中山率师北伐，陆幼刚任大元帅府度支处出纳主任。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陆幼刚协助总统府秘书林直勉、总统府参军林树巍，掌握陈炯明军事行动情报。孙中山脱险后，即领导讨伐陈炯明，军饷奇缺。陆幼刚找到广东省银行行长黄隆生，设法提取部分款项，及时供给讨伐陈炯明战争急需。叛乱平息后，陆幼刚任大元帅府秘书、法制委员会委员。1927年夏随林云陔到广东南路，执行蒋介石清党计划。旋先后任鹤山县县长、江门市市长、广州市政府秘书长以及广州市土地局、财政局、教育局局长。1931年，任广东省政府秘书长，曾二度代理省主席职务。同时，他还兼任广东师范学院、广东法商学院、广东省文理学院讲师、教授。在这期间，主编《广东文教》、《广州文教》杂志，创办《广州市民报》、《广州日报》等报刊。著有《国父史略》、《中国大学制度考》、《小学制度改革》、《广州革命史迹》、《广州文教史》等书。

1936年，陆幼刚任中国国民党广州市党部常委、中央监察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军风纪巡察团中将专员，巡视战争情况。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任广州市参议会议长，1947年被选为国大代表。

1949年，陆幼刚移居香港，创办培知中学并任董事长。后应邀赴美国南加州讲学，任罗省中学校长。

陆幼刚从政之余，还司诗、书、画，且有成就。他的《桂林寻梅诗》，反映较好，诗云“一枝疏影覆云根，西子桥霜印履痕。

待鹤归来人万里，江南重忆最销魂。”他的隶书比较有名气，被誉为“雄浑遒劲，自成馨逸。”他的画更有影响，《木棉图》是他的代表作。中山郑春霖所著《岭南画人传》中对陆幼刚传述说：“工诗，才气纵横，风味纯厚，性好游，暇辄啸傲溪山，搜奇摘异，见闻既广，阅历自深，画笔日益奇肆，盖山川文物，每每相因而成。”陆幼刚在这方面的著作有：《梅园诗稿》、《幼刚书画集》，曾于1949年前后刊印发行。

1983年，陆幼刚病逝于美国，终年91岁。

被孙中山授予中将司令的梁若谷

陈启著 梁承光

风光秀丽的信宜市思贺镇，自古以来就是一块风水宝地，这里人杰地灵，文人墨客层出不穷，武士将才各显风骚。国民党中将司令梁若谷就出生在思贺镇的寨岗村。

梁若谷（1892~1978年），孙中山赐号虚怀。1892年生。

他自幼聪明过人，好学上进，博览群书，胸怀大志，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考入了广州新军，习炮科。先后参加了“广州新军起义”、“辛亥广州起义”（“黄花岗之役”）和光复广州等革命斗争。在“黄花岗之役”前夕，参与协助温生才刺杀清朝广州将军孚琦的行动。1911年冬，梁若谷随海军北上抵南京，任炮兵连长。1913年升任少校营长，不久，任讨袁军第一支队上校司令。1915年回粤，任讨伐龙济光军第四路军少将司令。1917年，奉孙中山之命，粤军援闽，任炮兵上校团长。1920年回广州，1921年负责大本营警卫任务。1922年，梁若谷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任第二军炮兵少将团长。同年6月，陈炯明叛变革命，梁若谷任讨贼攻城司令，不久被孙中山授予中将军衔，后担任中央直辖军第一路中将军司令及东路讨贼军第七师中将师长，赴赣讨伐沈鸿英，后转赴粤西讨伐邓本殷。部队整编后，1923年梁若谷任东路讨贼军十三旅中将旅长，率部开赴增城、博罗、河源一带讨伐叛军。同年10月下旬，叛军林虎部进犯博罗的柏塘、派尾（今泰美）等地区。梁若谷于10月30日指挥所部第二十五团与叛军战斗，经过激战，把林虎部击溃，收复柏塘、派尾，缴获敌枪枝弹药一大批，受到讨贼军总司令通令表彰。1924年，江门、南路战事紧张，梁若谷奉命移师江门，与林树巍、黄明堂协同作战，讨伐叛军。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独立团少将团长，同年12月，参加镇压“广州起义”。随后改编为十七师四十七团开赴粤东，参加“剿共”和镇压海陆丰农民运动。1928年后梁若谷转到地方任职，先后任河源、大埔、阳山、新丰等县县长。在地方任职期间，他会同胞弟梁进谷先后出资为故里兴办文化教育事业，资助建立了思贺俊秀小学、博爱高级小学。1948年，梁若谷任广东省第二专区保安副

司令。

1949年，梁若谷奔赴台湾。1978年2月27日病逝于台北市，终年86岁。

十九路军少将副师长陈任之

陈启著

陈任之（1894～1955年），原名陈官曾，1894年出生，广东省信宜市水口镇陈村人。抗日爱国将领。

陈任之青少年时喜习武学军，关心桑梓治安。邻村被土匪抢劫，他自告奋勇，随练勇前往围剿。土匪突围，他一跃而上，把匪首打死，夺得曲尺手枪1支。辛亥革命爆发，陈任之将曲尺手枪变卖得光洋作路费，赴广州投奔民主革命，在林树巍部队中当兵。参加讨袁驱龙运动。1922年冬，随林树巍赴高雷讨伐陈炯明叛军余部，任营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连长，参加第一次东征。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陈任之随部队打平江，攻占汀泗桥、贺胜桥，10月10日，攻下武昌。陈任之任少校副团长。在河南对奉系军阀张作霖部作战。于1927年6月中旬占领开封。旋即回武汉，占领南昌，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一”

南昌起义。起义后，第十师在蔡廷锴率领下离开南昌，经进贤县到达铅山，陈任之任蔡廷锴部少校营长。1929年1月任第六十师一二〇旅二四〇团中校副团长。1930年8月15日，随部队攻占山东济南。17日，成立十九路军，陈任之任中校副团长。

1931年初，蒋介石调十九路军进入江西，参加第二、三次对中共中央苏区的“围剿”。在江西兴国高兴圩与红军作战，大败，人员损失过半。撤退时，找不到一个老百姓抬担架，把所剩下的士兵作担架队都不够。陈任之深有体会地说：“得人者昌的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从此，他吸取教训，决心不再与共产党打仗，积极拥护抗日主张。

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军向上海的闸北、虹口、杨树浦、吴淞口等地大举进犯。驻守淞沪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任中校副团长的陈任之，对全团官兵进行参战动员：“……过去，我们在内战中混了许多年，黑白不明，是非不分。今天总算有了抗日报国的好机会，如能为国家民族而战死沙场，才真是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才不愧作一个军人以终其生！”在他率领下，全团官兵斗志昂扬，与日军激战。他身先士卒，并上第一线，以骁勇善战著称。抗战有功，升任十九路军补充旅第一团团长。不久，他随蔡廷锴返抵广州，万人空巷，列队欢迎，称他们为民族英雄；各方人士与报纸称誉陈任之“勇敢善战，屡挫敌锋”。

1933年11月，“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史称“福建人民政府”）在福州成立，十九路军改为人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下辖五个军十个师。陈任之任第五军第九师少将副师长。“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陈任之被送至南京中央军校高级班受训。

1938年2月，在梅菪成立“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张炎任主任，陈任之任副主任，提出“抗战利益高于一切”、“保乡卫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等口号，

号召各县成立民众抗日自卫团。不久，在张炎的推荐下陈任之出任电白县县长。1939年蔡廷锴任第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把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改为第七区游击司令部，张炎任游击指挥官，陈任之任副指挥官。陈任之协助张炎，开展抗日活动，打击同日伪狼狈为奸的反动势力。

1941年任广东省曲江县县长，在韶关创办“高凉文化会”，宣传抗日救亡。1944年秋，任广东省政府西南行署警保处处长。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高州同乡会”在广州成立，他任理事长。1949年夏末，陈任之赴香港定居，任贤初农场经理。1955年11月在香港病逝，享年61周岁。

岭南画派画虎艺术大师周璠璋

陈启著

周璠璋（1898~1977年），由于擅长画虎，画名周啸虎，1898年出生，广东省信宜市怀乡镇人。岭南画派著名画家。

他在中小学读书时期起便钟情于画画，颇有成就。高中毕业后1918年考入广东国民大学，边读书边在广州市一些中学及中大附中等校任图画教师。后来，又考入广州春睡画院，师承岭南画派创始人高剑父，系统学习绘画技能，并与关山月、黎雄才、方人定、何磊、苏卧农等画坛泰斗为同门师兄弟。当时，春睡画院

学习山水、花鸟、虫鱼、人物的学生都有了，高剑父提议璠璋学习动物画，以画老虎为主，兼学山水、花鸟。他秉承高剑父的教导，几十年如一日地致力于自己的虎画艺术创作实践。他认为画虎就必须把老虎变成为自己的艺术技巧，这就得对虎的生长、生活、习性、生态、各种神态、形态等等都有全面的、深刻的、娴熟的理解，不但能摹写、写生，还要能默写。他为此而深入老虎的客观世界里去，曾到南洋群岛的石山峻岭、黄草大林实地深入观察，全面研究虎的生活、行踪、活动环境、习性，并定居于马来西亚两三年，自己购买了一只老虎用铁笼饲养并加以驯服，野虎和驯虎都为他所用。通过长期观察，在脑子里积累了各种老虎凶猛、活泼、多姿的自然现象以及它的形态、神态，主观形象的构造融合了客观自然，对他产生了浓郁的艺术感染力，他画的老虎与天然虎一样逼真、生动、完美。不论是上山虎还是下山虎，也不管是跳涧虎的虎威，还是雄视大地的回眸，总是栩栩如生，达到了“一声长啸谷生风，雄威凛凛百兽惊”的艺术境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画虎风格，从而成为我国画坛上少有的虎画名家。我国著名画家何香凝对周啸虎的画《虎妈妈依偎幼儿怀里》，赞叹不已，誉为“创意新颖，警世之作”。

抗日战争期间，他曾任广东省政府艺术室主任，在广东、湖南抗日前线，以虎为武器，画虎威来鼓舞士气。1941年，他在韶关、曲江等地举办个人画展，以《威虎八面》等虎画作品唤起广大民众同仇敌忾，奋勇抗战。他的画服务于政治，服务于人民群众，深得人民赞赏。后来，他还两次在澳门参加由高剑父主办的有同门师兄弟何磊、苏卧农等著名画家参与的联合画展。

抗战胜利后，周璠璋寓居广州，任中山大学附中图画教师。

1947年间，在香港和何香凝画家联合举办画展，很受赞誉。尔后，何香凝由港回穗，受到广州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周啸虎积极参与筹备欢迎工作。后来，他又和何香凝一道参加在广州市文德路中山图书馆联合举办的有高剑父、高奇峰、关山月、赵少昂等名画家参与的联合大型画展，璦璋以他的部分新旧作品，参与展出。

周啸虎一生追求艺术，对名利淡薄如水，他曾指出：搞艺术不能看重钱财，艺术是社会的，必须将艺术奉献于人民。他曾将画展收入捐给广东省孤儿院。1948年，高州、信宜等地水灾严重，周璦璋举办画展义卖捐献给当地灾民。1949年，家乡解放后，周璦璋在家乡居住。1950年，信宜怀乡地区遭遇特大洪灾，河堤被毁，农田严重受损。璦璋即在家乡举办救灾画虎义展，取得稻谷3000多斤，全部捐献给灾区群众。

周啸虎的画严谨细致，生活气息浓厚，以形写神的画风特色，博得人们的称赞。他曾在东南亚各国、粤、港、澳等地区举行过多次个人画展，在广州参加过高剑父先生主持春睡画院开办的大型画展。他在几十年艺术生涯中，勤奋琢磨、掏尽心血创作了大量的、有新意的、一点一线都毫不马虎的作品，可惜在历次运动和10年“文化大革命”中，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烙印，而绝大部分被销毁了。近期，他儿女周绮娜、周振邦把收藏他未失散的极少部分画，编成《周啸虎画集》出版，真是不幸之大幸也。

在《周啸虎画集》中，广东省省长朱森林题“狮虎雄风”之题词；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广州画院院长、文化局副局长陈永锵敬题“啸虎前辈遗墨”之题词；国画大师关山月题词“笔下留虎威”；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黎雄才题“周啸虎画集”、“虎啸风生”；广州美院教授苏百君敬题“啸虎世伯遗迹”之题词。

《周啸虎画集》出版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数十名将军收集他的画集，海外美术界人士和侨胞、港澳台同胞纷纷争购。周啸虎的画作先后入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金融时报》、《城市金融报》、《战士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

信宜农民运动的先驱梁本荣

陈启著

梁本荣（1899～1928年），1899年出生，广东省信宜市思贺镇寨岗村人，是信宜市最早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著名的革命烈士。

梁本荣青少年时期曾在思贺兴华小学和罗定县罗定中学读书，初中毕业后考入肇庆甲种农业学校学习。在校期间，他受到革命宣传教育。1925年秋，设在广州的“中国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第五期学员，他毅然放弃甲种农校学籍，前往报考。被录取编在乙班当学员，在学习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25年12月8日毕业，梁本荣被当时的国民革命政府中央农民部任命为特派员，回信宜县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思贺圩日，梁本荣以唱白榄、唱山歌和演说等形式，进行革命宣传，发动农民参加农民协会。他还写了一些通俗易懂的革命歌谣，教农民传唱，其中一首是：“我地工农兵，几万万弟兄，流落穷鬼县，一春复一春，工厂当牛马，田园当奴隶，战场当炮灰，打死无数

计，怎样过一世？！人多本应势力强，我地唔好做衰仔，只有去奋斗没收佢田地，大家分到够，工农齐起来，城市归我有，士兵掉枪头，军阀变成丧家狗。呢阵时，当家作主人，做一番好世界，组织苏维埃，肃清反动派，有福大家享，有苦大家捱。土地革命大成功，民心皆大快！”

1926年3月7日，广东省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正式成立，梁本荣被任命为南路办事处农协委员，继续回信宜开展农民运动。他明确提出实行减租减息，实行“耕者有其田”，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到1926年初夏，思贺地区已有十多个乡成立农民协会，农会会员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并成立了“信宜县思贺特别区农民协会筹备处”，组建了一支农民自卫军。

1927年7月，梁本荣奉命调往茂名县（今高州县）从事农民运动。11月14日，茂北区农民协会成立，他代表南路办事处前往祝贺。有一次，梁本荣和黄学增到高州附近农村进行调查考察，农民普遍反映，外号“活老虎”的恶霸杨老二经营大利公司，垄断县城的全部大粪，不仅从中剥削农民，而且搞得全城臭气熏天，群众敢怒而不敢言。梁本荣立即编了一首辛辣的顺口溜：“广潭杨老二，屎桶写大字，老虎变成狗，吃屎！”教群众到处传唱，把这个地头蛇搞得臭名远扬，十分狼狈，最后不得不把大利公司关闭。

1927年4月上旬，梁本荣代表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南路特别委员、广东省南路农民协会办事处主任和中国共产党南路特派员黄学增前往阳江检查党务工作。“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阳江的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4月15日凌晨2时许，梁本荣和其他15位农运干部，在国民党阳江县委被敌人逮捕，于5月3日押解广州集中营。被囚期间，梁本荣不为利诱，不怕威迫，不动亲情，宁死不屈，表现了共产党员的崇高气节和革命英雄气概，并且在敌人面前明确表示：“我是共产党员，你们害怕，就立即杀

我。但是，你们杀死一个梁本荣，还有千万个梁本荣活着！”其堂兄梁某到监狱劝降，被梁本荣严正拒绝；其亲叔也去监狱探望，见到梁本荣遍体受伤，不禁嚎啕大哭，梁本荣则批评其叔说：“你真是没有出息，男儿流血不流泪，古已有之。你却变成了小脚女人。”敌人把梁本荣折磨了一年又三个多月，仍然一无所得，终于在1928年9月5日，把他押赴黄花岗刑场杀害。

梁本荣壮烈牺牲后，旅居广州的乡亲和革命战友们自动捐资买棺木，把他的遗体埋葬在三元里的山坡上，碑上刻着：“信邑梁本荣之墓”。新中国成立，骨骸移迁广州银河公墓。

著名侨领李孝式

陈启著

李孝式（1901~1988年）是马来西亚独立后的首任财政部长，开国元勋之一。

1953年起先后任马来西亚铁道部长、交通部长和财政部长，时间长达7年。这是在外国任部长级职务的第一个广东信宜籍人。

李孝式，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十日（1901年1月9日）出生，广东省信宜市梓童坊大路街人。民国元年（1912年）就读于岭南大学附小。1914年升入广州中学，1915年便转入香港皇仁书院读书，皇仁书院是仿英国式的十年制中学，毕业后直接留学英

国，就读于著名的剑桥大学。由于学习刻苦，1923年获经济、法律两科硕士学位，还被推举为经济学院董事。1924年回到祖国，旋即随他父亲、华侨实业家李季谦到马来西亚经营锡矿业，从此时起，他便致力于华人社会的公益事业，为华侨办了许多实事，信誉卓著。他历任吉隆坡市政府议员15年，雪兰莪中华总商会会长长达16年。任马来西亚高州总会会长、雪兰莪广东会馆会长、雪森彭矿务公会会长。由于他从事公众机关10余年之首长或董事，使他成为一方侨领。

1937年日本大举侵略中国时，雪兰莪华侨气愤填膺，奋起组织筹赈祖国难民委员会，李孝式奔走呐喊，被举为会长。当时筹募到巨额义款达1000多万元，有力地支援祖国抗日战争。1941年日军侵入马来亚，他穿上戎装，被当局委任为吉隆坡防空总司令。南洋失陷后，他不得不撤离赴印度，再回祖国抗日陪都重庆，受命任印度抗日联军上校参谋，继续抗击日本侵略者。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孝式返回马来亚，立即创办《中国报》，使炎黄文化在华侨中不致中断，亲自出任董事长。与此同时，他向当地政府提议成立“华人矿务复兴贷款委员会”，给华人矿业贷款2000万元，矿业是马来亚的经济命脉，亦是华侨衣食之源，此举，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人矿场得以迅速复兴，随后组织“马来亚华人矿务委员会”，他被举任会长。

1948年，马来亚联邦成立，他被任命为非官方立法会兼行政会议员。1949年，李孝式为了有利于华人在马来亚联邦政治地位的稳定，便积极组织“马来亚华人公会”，他被举为总会政治组织主任、总会副会长。1952年，为谋求华巫两大民族的亲善和政治方面的发展，他以卓越的政治眼光组织马华公会与巫统机构的联

盟政党。1953年，李孝式任海港铁道部长，翌年任交通部长。1955年，马来亚全国大选，李孝式为联盟圆桌会议主席，复为联盟竞选委员会副主席，大选结果，联盟在52席中得51席，联盟受命组阁。1956年，李孝式两次与首席部长往英国，与英政府谈判马来亚独立与国防条约以及财政问题，并参与马来亚独立的签字仪式。不久出任首任马来西亚财政部长。更为难得的是获得爵位。1956年，李孝式获英皇封为K. B. E爵士。1959年，马来亚全国只有4人。从此之后，李孝式署名为：敦·李孝式，这是令人尊敬的头衔。他于1966年后致力于金融业方面发展。创立兴业银行，资产达4.1亿美元，并有附属机构，其资产亦达1.48亿美元。

敦·李孝式晚年仍然热心故乡的公益事业，对桑梓故土的信宜华侨中学的兴办，给了大力的支持，并亲笔书题“华侨中学”校名，使他的美名频传遐迩。

敦·李孝式在1988年6月22日离开了人世，享年87周岁。他的一生，反映了华侨在海外奋斗的业绩，后来落籍马来西亚，荣获勋衔，造福华人。无愧为炎黄子孙的精英。

抗日中将军长梁汉明

陈启著

梁汉明（1901~1996年），号星海，乳名少辛。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出生于信宜镇隆镇大水坡村。梁汉明出生于书香之家，父亲梁树熊，字辛尝，清朝秀才，他同高州六属的开明士绅一起创办高州中学堂，担任监学和国文教师，后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协助林云陔领导高州反正成功，任高州军政分府民政长，后任孙中山总统府机要秘书，还先后任过茂名、鹤山、德庆等县县长。

梁汉明青少年时在广州圣心中学读书至毕业，考入黄埔军官学校为第一期学生。与梁华盛、陈沛、甘清池、董煜、吴斌、甘达朝、李及兰等10位同学结为异姓兄弟，后来个个均官居要职。毕业后参加讨伐陈炯明战役，任排长，在战斗中带领全排战士勇越城头，遇险不惊，猛烈冲锋。北伐战争中在第四军一师任排长，参加汀泗桥、贺胜桥诸战役，率领战士冲锋在前，战斗中以胆略见称，遂由排长升任连长，不久升为营长。后任安徽保安团团长。抗日战争初期，他先后参加台儿庄大战、武汉保卫战、昆仑关争夺战，立下战功，被提升为九十二师副师长，不久升任师长，领导该师时间较长。率领该师参加第一、二、三次长沙大会战。1942年，在第三次长沙大会战中，2月4日，配合友军由西北向西南，总会攻长沙方面之敌；是月7日，在李家段、新开市和神鼎山截击日军第九旅团，激战至次日，歼敌大部分。因在第一、二、三次长沙会战有功，1943年梁汉明升任九十九副军长，旋升中将军长，驻湖南益阳。是时，日军急欲西进，倾巢而出，并吸取先前三次会战失败的教训，第四次会战改用重兵东西夹击方法，出动了20万兵力，猛扑长沙。梁汉明的九十九军，负责湘阴江防与沅江湖防之守备任务。此次阻击战进行得十分激烈。敌犯沅江时，九十九军九十二师二七六团奋勇抗敌，经过逐岛、逐屋之争夺，

毙伤日军甚众。而二七六团亦伤亡甚大，团长邹鹏奇身负重伤，梁汉明身边卫士谢有也中弹身亡，军参谋长常百川弃职潜逃，局面混乱。在此危急情况下，梁汉明仍指挥镇定，不顾危难，率领总队退守粤汉铁路东西两线，阻止日军南下。此次会战战线之长、时间持续之久、战斗之激烈、牺牲之大，实属罕见。梁汉明率九十九军在战争中跨江守备，转战千里，任务艰巨。在战斗中，梁汉明激励所部官兵，誓与阵地共存亡，勇敢杀敌，不怕牺牲，保卫祖国。日军伤亡也十分惨重，后他们绕道避开九十九军及其他友军的锋芒而逃窜。

第四次长沙会战后，梁汉明率九十九军参加常德战役和长衡战役，均取得重大战果。他因在抗日战争中累立战功，而荣获甲种一等奖章、云麾奖章、忠勤勋章、胜利勋章等7枚之多。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梁汉明驻江西九江，他以九十九军军长兼江西受降官的身份，接受20多万（一说10多万）日军投降。

1946年，九十九军改为整编六十九师，梁汉明任师长，旋调任国防部中将参议。1947年，薛岳任广东省主席，梁汉明应邀担任广东省第二保安师师长，驻扎广九铁路沿线。1949年10月，梁汉明带家属移居香港；1953年迁至台湾，以诗书自娱，终其余年。1989年3月，他赋诗陈燕茂（原国民党63军少将参谋长，曾任梁汉明九十九军上校副参谋长）：“万水争流出海洋，千山雄立属华疆。共和五族永安乐，一统河山世富强。”

梁汉明治军甚严。有一中校营长赌博后行凶，用手榴弹炸伤多人。梁汉明接报审核属实后立即处以极刑；而对该营长家属给予厚恤。梁汉明对士兵一直仁爱有加，凡士兵有伤病者，常亲往

慰问，其家属生活有困难时则给予救济。上级发下之奖金或物品，全部分发下属。当军长、师长时，不开小灶，与部属一起在饭堂吃饭。20世纪70年代，香港出版一部《抗日战争史料：江山万里行》，著者罗振声，该书以《梁汉明席不正不坐》为篇名，叙述目睹九十二师独特用餐礼节：“副师长艾 暨参谋长、各室主任，先端坐在饭桌畔恭候，等师长（梁汉明）入座，大家再起立，彼此相向一鞠躬，然后才坐下用餐，可谓座不正不坐，十分注重礼仪。”

梁汉明一生清廉自持，从不敛财。在家乡信宜不建新屋，不置田地；在香港闲居赖亲友资助过生活；在台湾后，家庭开支主要靠其妻在银行工作之薪金维持，说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945年秋，梁汉明在江西九江接受日军投降期间，当地有一汉奸头目张园西曾托人送一大筐苹果到梁汉明驻地给他，下面藏有12块金条，梁汉明知道此事后，立即派副官将原物退回去。张园西看见不妙，只好仓皇逃逸。梁汉明到台湾定居之初，正值军方得到一笔巨额美援款项，计划分发退伍将官，供作安家费用。梁汉明率先反对，建议将该款筹建一所退伍军人医院，并得一群将领的支持。当局接受梁汉明的建议，建成一所蜚声国际的台湾荣民总医院。

梁汉明又是一个儒将。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且能诗能书，挥洒自如。除军事外，还学文学、哲学、书法，也学外语，英语和日文书本，他能够看懂。罗振声记述云：“梁爱吟咏，好金石，喜作五七言诗。我受招待入住其副军长套房，凌晨一早，及半夜深宵，即能闻其执卷吟哦声。”1969年，罗、梁二人重逢于台湾，梁汉明指出罗振声新作中，数见“投笔从戎”之句，不若改为“挟

笔从戎”更为切当。可见梁汉明一直以“挟笔从戎”自豪，他自况诗云：“皎洁心清秋夜月，纵横意气海天龙”、“虽经怒发千丝白，未许雄心半点灰”，道尽儒将胸怀。

1944年，梁汉明在天岳关黄龙山建无名英雄纪念碑，碑上亲书“灵护天岳，气壮黄龙”8个大字。又建无名英雄纪念祠，亲题对联“烈士有绩，有所纪绩；英雄无名，无以能名。”刻于祠两旁，供人瞻仰。1945年秋，他在九江接受日军投降后，在庐山建造一座九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他亲撰一副对联刻在碑上，曰：“风萧易水屠龙去；月冷庐山跨鹤归。”

1945年冬，梁汉明驻防九江市，军部几个头头和副官随员10余人上庐山游玩，他跟大家一起爬山，到达牯岭已是月上林梢了。梁汉明提出能够写旧体诗的人都要写一首来，以留纪念。大家写好后，一致认为他写的五律最好：

“众人皆好汉^①，联步上高坡。
天际星堪摘，岩前雪可搓。
冷月迎新客，苍松绕旧萝。
投光轻扣户^②，炉畔笑吟哦。”

① “好汉”语意双关，既指登山之人，也指登牯岭要爬一个“好汉坡”。

② “投光”，即投宿之意。

中共信宜县委第一位书记罗克明

陈启著

罗克明（1902～1932年），广东省信宜市池洞镇扶参村人，中国共产党信宜县委第一位书记，怀乡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

罗克明1902年出生于扶参村，幼年时随祖父迁居怀乡镇百片坑村。1919年秋考入广东省立第九中学，学习勤奋，是班内的高才生。1922年秋中学毕业后，任怀新小学语文教员。1925年秋考入广东国民大学学习，积极投入学生运动，旋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5年12月，罗克明受中共广东区委委派，回信宜从事建党工作和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1月，首先吸收了青年学生陈维世、潘定耀、雷永安等加入共青团，建立起信宜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他以这个支部为核心组织“醒民剧社”，运用演话剧和街头讲演等形式，在怀乡圩和农村进行宣传，还在附近农村开办夜校，团结教育农民群众。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先后在怀乡、中堂、平花、洪冠、平梅等十多个乡建立起农民协会。7月，在怀新小学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通过农会章程和决议，正式成立怀乡区农民协会。

会后，开展减租减息，破除迷信，禁止蓄婢和买卖婚姻等活动，清算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赖莘农。

1926年冬至1927年4月上旬，罗克明领导怀乡区和各乡农民协会，进一步扩大组织，并新建立了两个区和35个乡的农会，全县会员达4万多人。同时，他吸收大批青年积极分子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扩大了共产党组织和共青团组织，在县内建立起怀乡、东镇两个区的党委会和13个乡党支部，党员发展到210多人，共青团员达700多人。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信宜县多数农会组织和农卫军被国民党反动派解散了，但由于罗克明处理得又早又好，怀乡地区的农会组织却岿然独存。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被迫转入秘密活动。1927年5月，中国共产党信宜县委员会成立，罗克明和朱也赤（中共南路特委委员）、陈业之3人为县委会成员，罗克明任书记。中共信宜县委根据中共广东省委和中共南路特委关于组织武装起义的指示，在怀乡地区继续组织武装队伍，12月15日，发动了震动粤西的怀乡起义。起义部队成功地攻下了七区团局和二区区署，夺取怀乡印金仓库的存粮数百担。16日在怀乡圩背大营地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了怀乡区苏维埃政府。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县兵、民团1000多人前来围剿。由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罗克明决定撤离怀乡，亲自率领武装部队数十人，转移到白石扶龙白泥冲，与敌激战四昼夜后，他率领部队突围转到洪冠。

怀乡起义失败后，罗克明被敌人悬赏通缉，他的家庭惨遭洗劫。罗克明带着潘定耀、张敏豪等人转移到钱排、达洞，重新组织起武装队伍70多人，发展共产党员30多人，继续坚持武装斗争。1928年秋，信宜县长杨伟绩请调正规军一个营，来达洞清乡

扫荡，形势空前恶化。罗克明被迫离开信宜，前往香港。

1928年秋，罗克明等4人在香港找到中共广东省委机关，他奉命留在香港、澳门工作。1929年秋他转移到马来亚，同潘定耀、张信豪、杨万禄等汇合，筹集资金，创办《星洲旬刊》，他担任主编，宣传马克思主义，倡导革命；后来改为《星洲周刊》，深受侨胞的欢迎，却不为当地政府所容许，1930年2月间被查封，他和潘定耀等人亦被驱逐出境。上级调他到广西桂林大学任助教，从事秘密革命活动。1931年春，他奉命回到广东工作，改名马鸣陆，在中山泥湾育英小学当校长，继续秘密进行革命活动。

1932年春，罗克明又被调回香港工作。此时，他的肺病已到后期，中共香港组织的领导人安排他入医院留医。他婉言辞谢，默默忍受着疾病的折磨，继续抱病坚持工作，直到病危才入医院治疗。1932年秋末，病逝于香港九龙广华医院，年仅30岁。

汪精卫汉奸集团的吹鼓手林柏生

陈启著

林柏生（1903—1946）年，号石泉，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荔枝村人。汪精卫伪政权汉奸集团的吹鼓手。

1903年11月，林柏生出生于地主家庭。1915年就读于高州

中学，课余向当地一美国教堂神父学习英语。1920年赴广州，入美国教会学校岭南大学读书。1923年初，因参加罢课活动被开除出校，旋执教于广州执信中学，任训育主任。1925年，他由执信中学校长引荐，任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秘书。同年9月，由江精卫保荐，偕其妻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并与陈春圃被指定为国民党方面选派的党员和国民党中央的联络人。次年9月，返广州，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

1927年12月，汪精卫被迫宣布“引退”去法国，林柏生随同前往。其时，汪精卫打出维护国民党“法统”的旗号，鼓吹重新改组国民党，林柏生便创办《留欧通讯》（后改为《欧美通讯》），宣传汪精卫的改组主张。1928年5月，林柏生提出应当使国民党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政党，“既非代表任何单阶级的政党，更非各阶级的大联盟”，汪精卫称赞是“反共以后清厘本党理论的一篇重要文字”。同年底，国民党美欧总支部所属之两大机关报——旧金山的《美洲民国日报》与纽约的《民气报》要求派人指导宣传，林柏生即奉汪精卫之命前往美洲，在华侨中宣传汪精卫的政治主张。1929年冬，林柏生受汪精卫之命到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次年2月又创办《南华日报》，任社长。

1932年1月，蒋汪合作，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拨款20万元让林柏生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1934年林柏生任民国立法院立法委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中华日报》停刊。他带着报社主要成员到香港，主持《南华日报》，并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驻香港特派员、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

1938年2月，汪精卫主持的“低调俱乐部”在汉口成立了“艺文研究会”，以“反共媚日”为其宣传宗旨。林柏生立即在香港成

立国际编译社，创办“蔚兰书店”，与“艺文研究会”遥相呼应，积极宣传汪精卫的“抗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等投降主义谬论。同年12月汪精卫由重庆逃到河内，草就投降日寇的声明稿，交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至香港，交林柏生、梅思平一同签署。12月29日，汪精卫在越南河内发表“艳电”，林柏生即在他主持的《南华日报》和中央社香港分社发表了这一投降声明。香港爱国同胞见到《南华日报》发表汪精卫的投降声明后，举行示威抗议，包围《南华日报》社并捣毁报社的门窗和印刷设备，追查林柏生的去向，搞得林柏生不敢公开露面。之后，又连篇累牍发表社论，称汪之“艳电”是“出于爱护国家之苦心”，是“对于国家民族所遭遇极度危难之真知灼见”，是在中国沦于“傀儡”与“共产”之外，“打出一条光明而充满希望之生路”。由于积极参加汪精卫叛国活动，他被定为汪伪集团八个“首义”分子之一。

1939年8月28日，汪伪的“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林柏生参加了会议，并当上伪“中央委员会”常委、伪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参与修订汪伪的“中国国民党党纲”，9月10日，上海《中华日报》复刊，林柏生兼任社长，并派穆时英出版《民族日报》，古咏今出版《国际晚报》。这些卖国报纸一出版，立即受到上海抗日民众的抵制，报贩拒绝售卖，人们将这类报纸撕成碎片。

1939年底，林柏生随同汪精卫与日本参谋本部代表影佐祯昭谈判，商订“和平基础方案”；12月底，在上海签订了卖国的《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1940年1月20日，他出席了在青岛召开“临时”、“维新”两个伪政府会商合并的会议，研讨组织所谓联合政府问题。3月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组织伪

中央政治委员会，拼凑伪中央政府班底，林柏生任政治委员会委员。3月30日，汪伪“国民政府”在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下在南京宣告成立，林柏生任“行政院”宣传部长。他上台后，立即接管了沦陷区的文化宣传机构，成立伪“中华通讯社”，他兼任社长；又成立“中央报业经理处”、“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电影检查委员会”和“国际宣传局”等，钳制沦陷区舆论。还创办“宣传干部讲习所”，诱骗青年学生受训，然后分配于汪伪各文化宣传部门。

1941年初，日本决定对汪伪政权统治地区进行政治、军事、思想三位一体的“清乡”运动，林柏生任“清乡委员会”委员。他主持在南京举办“清乡”宣传周，大造“清乡”舆论，并多次窜到“清乡”地区“视察”，鼓吹强化汪伪政权是“现阶段和平运动的中心任务”。而“清乡工作却是强化国民政府的第一桥梁”，扬言要把“清乡”运动扩展到汪伪政权“力所能及的每一个角落”，以至“力所能及的每一寸土地”。

1941年冬，汪精卫发动一个所谓“新国民运动”，颁布《新国民运动纲要》，成立“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林柏生任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主持实际工作。他向汪精卫献策：“新国民运动”应从青少年入手，然后推广到社会上去。这一建议，得到汪精卫的赞许。在汪精卫支持下，林柏生先后成立“模范青少年干部学校”，组织“青少年团”，举办“青少年集训营”，并亲自担任干部学校教育长（校长汪精卫）、“青少年团”总监、集训营营长，向青少年进行亲日宣传，灌输法西斯“武士道精神”。1943年1月9日，汪伪国民政府发表对英美《宣战布告》，并决定在伪中央政治委员会设最高国防会议，林柏生任最高国防会议委员。

接着，他作为汪伪国民政府代表之一和日本帝国主义代表讨论缔结“中日同盟条约”。同年11月，林柏生所控制的伪中央宣传部宣布“确立战时文化宣传体制，动员文化宣传总力”。他以广播、报刊、电影、戏剧等宣传工具鼓吹在“大东亚战争”时期要加强“反共”、“反蒋”和“反英美”的思想决战，“务使思想上之决战与武力上之决战相互辉映，以共同完成此伟大艰难的战争”，“吾人之笔即吾人之枪杆，虽效死疆场亦所弗辞”。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讲话，广播，发行他的演讲录音片，如《由“九一”追想“九九”》，1944年7月间对重庆的广播，1944年11月间对记者之谈话，1945年1月间为大东亚战争三周年纪念广播词等，为日寇永远占领中国而大造反动舆论。同时，勾结淮海省省长郝鹏举、伪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黄自强，在南京秘密组织一个隶属伪中央宣传部的“政治工作局”，仿造共产党的《新路东报》，散发于苏北解放区，每期千余份；又编写《关于第三国际之解散》、《苏北黄桥事变》、《山子头事件》等十几种小册子，分发给汪伪中央政府各部长、伪省政府主席、伪军司令及各地伪党部，“以增加反共情绪”。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日军败局已定，伪政权面临树倒猢狲散之势。林柏生于1945年1月辞去宣传部长之职，出任安徽省省长，兼任蚌埠绥靖公署主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24日，林柏生潜逃日本，躲藏于京都金阁寺。这时，全国人民掀起了惩办汉奸的怒潮。10月13日，林柏生被引渡回国，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1946年5月31日，民国首都高等法院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之犯罪行为”，判处林柏生死刑，经民国最高法院复判核准，于同年10月8日处决。

解放军首批授衔女上校谢荃

陈启著

谢荃（1912~1970年），女，1912年出生，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六厚洞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秀卫生工作者。上校军衔。

谢荃童年在家乡私塾就读。1927年随父到广州读书，1932年毕业于广州市立师范，任广州市第十二小学教师，她工书法，临摹唐人钟绍京小楷字帖《灵飞经》，运笔珠圆玉润，形神酷肖，同事叫她“钟绍京”。

1938年，八路军驻粤后方办事处在广州发动知识青年赴延安学习。谢荃了解延安的生活和学习情况后，决定前往。她婉言谢绝国民党南京政府某部长侄子王某的求婚，辞去教师职务，放弃优裕的生活，变卖母亲留给她做嫁妆的一对金镯，还向堂兄借了一百元大洋作路费，于是年8月随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由广州出发，冲破反动派的层层封锁和拦截，到达西安；再从西安绕道步行了12天，9月到达延安。

谢荃先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改读军医大学。1939年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在军医大学毕业后，随丈夫李迎希将军到八路军三五九旅卫生队工作，转战于晋西北、晋察冀和冀中等抗日根据地。

1945年8月后，她在鲁中军区四师，参加了胶济战役和陇海战役。

1947年7月，谢荃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八纵队任野战医院院长，旋调任山东兵团野战医院院长，先后参加了济南、莱芜、枣庄、临沂、苏北、沂蒙、孟良崮、孟州等战役。在沂蒙山区，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医疗设备简陋，药物十分缺乏。她团结同事，想方设法，派人越过敌人封锁线，从外地购回各种必需的药品和医疗设备器材，克服困难，真正把战地医疗工作搞好。在苏北一次战役中，她负责护送一批伤员转移，敌人射来的子弹穿过她的棉衣，打伤肚皮，血染征袍。她镇定自若，敷药止血后，继续护送伤员到达安全地点，又坚持上前线战斗。

1949年，谢荃随部队渡江南下，进入杭州，任第七兵团军医一院副院长。在解放战争中，她立二等功两次，荣获“人民功臣”称号，晋升为团级干部。

1950年12月，谢荃任中央军委直辖工程兵卫生科科长。1956年调任武汉军区后勤部卫生科科长；1957年被授予上校军衔。

1970年3月，谢荃因患食道癌在武汉逝世，终年58岁。

模范军属罗绍秀

陈启著 梁承光

罗绍秀,女,1912年4月(壬子年三月)出生,信宜市池洞镇大坡村人。中共党员。曾任生产互助组长、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大坡大队(村)妇女主任、党支部副书记、县委委员等职。她有6个儿子,先后送5个儿子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且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教育鼓励儿子。她是一位模范军属。是信宜县、湛江地区、广东省先进工作者,是信宜县优秀共产党员。

罗绍秀在工作中,处处带头克服困难,关心群众疾苦,助人为乐。

1955年,信宜地区旱灾严重,她就毅然把自己大儿子从部队退伍带回的180元生产费拿出来,分送给10多户困难较大的农民,动员他们投入抗灾斗争中去,结果,大旱之年夺得粮食大丰收,使新办起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得到巩固发展。全村农民都感谢罗绍秀大大公无私的热情相助。

1969年,罗绍秀家修建房子,粮食有点困难,正好国家拨来

了一批统销粮，大队（村）分给她 70 斤，说有困难的军属都有份，有困难的干部也有份。罗绍秀坚决不肯要，让给其他有困难的农民；这时，生产队也给她补助 100 斤粮食，说是经过全队社员评议给的，因她是属于有困难的军属。罗绍秀表示说：“自己有点困难可以克服，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要让给贫下中农多分享一点。”她坚持把这些粮食让给了其他有困难的农民。

自从国家对农村基层干部到县里开会发给误工补助以后，罗绍秀每次到县里开会回到大队（村），都把领取的误工补助费如数交给集体，从来不往自己口袋装过一角一分。一些好心人曾劝她：“你工作辛辛苦苦，这点钱就零花了。”她总是笑笑地答道：“我们穷人当干部掌权，开会还要领补助么？！”她日夜工作，不计较个人得失，连每年生产队按政府政策规定给军属照顾的工分、财物，她从来不肯要过。

“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推荐上中学、大学的。1970 年，群众一致推荐罗绍秀小女儿到池洞中学读高中。她见到在解放前三代做长工、祖祖辈辈不识字的贫农儿子刘星章没被推荐上，就主动到群众中去说服群众，把自己小女儿的学位让给刘星章。但刘星章因父亲身有病，家庭生活有困难，不愿上中学。于是罗绍秀主动帮助刘星章家还清了欠信用社的 70 元贷款，又为他缴交学杂费，积极支持他上高中；并四出找药医治好他父亲的病，使刘星章顺利地读完了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长生田村转业军人刘裕华的母亲，生活上诸多不方便，儿子和媳妇都在外地工作，罗绍秀就经常给她送柴送米，当她有病的时候，就主动请医生诊治，给她买药，亲自煲好送上门去。刘裕华的母亲激动地说：“绍秀呀！比我亲生姐妹照顾得还周到。”罗

绍秀满怀感情地说：“有了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解放，我们之间谁有困难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嘛！”

罗绍秀当农村基层干部 30 年如一日，凡事都出以公心，为了群众利益，随时都肯牺牲自己个人的利益，群众称赞她是一个“好党员，好干部，模范军属。”

1956 年起，罗绍秀兼任乡（大队）的接生员，常常深夜里风雨无阻出外接生。后来，领导上考虑到她的工作比较多，安排年青人接替她这份工作。可是，村里，邻村的，甚至外公社（镇）的一些产妇，都要请到罗绍秀才心满意足。对工作极端负责的罗绍秀，也不愿意辜负群众的期望，依然是随叫随到，急时，用有线广播通知她，她也及时赶到。

农民叶正英，难产大流血，危在旦夕，她的丈夫在家里急得团团转，罗绍秀闻讯赶到，即刻给她请医生，赶快送她进医院，并主动拿出自己卖肉猪存下的 60 元钱替叶正英交了住院费，同时日夜守候在病房，直至叶正英病好出院。叶正英和她丈夫万分感谢罗绍秀说：“绍秀呀，你是我们家的贵人、救星！”

1968 年 6 月的一个晚上，罗绍秀正在大队（村）开会，相邻的岭砥大队（村）有个群众来叫她去接生，这一天，她身体有点不舒服，但她毫不迟疑，背上药箱就去了。从岭砥大队（村）回来已是夜 12 时多了，刚到家，本大队（村）便有两个农民来叫她去接生，她二话没说，立即就出门去了，直到深夜 3 时多才回到家里，又累又困，正想躺下，横垌村又有个农民来叫她，她马上跟来人赶到横垌村，在横垌村还未完成接生任务，黄六坡村又有个农民赶到横垌村叫她去接生。她不顾一天劳累，又赶到黄六坡村，一直忙到第二天上午 10 点多钟，才踏上归途。由于过度劳

累，加上身体有点不舒服，回到半途就晕倒在地上，幸好是白天有农民救她回家。农民激动地说：“绍秀为了我们的疾苦，磨破了脚板，操碎了心啊！”罗绍秀当干部30年，单是给困难户送小猪就有11头，现金有四、五百元，鸡蛋、粮食就无法统计。人们敬佩她，祝福她说：“罗绍秀这么好心肠，祝她活到一百岁！”

罗绍秀在30年工作中，时刻严格要求自己，极端廉洁勤政；同时长期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处处以普通劳动者出现。由于罗绍秀的事迹突出，影响很大，中共信宜县委曾于1974年1月13日作出《关于开展学习罗绍秀同志决定》，号召全县广大共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学习罗绍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质，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罗绍秀因病医治无效，于1991年11月逝世，享年80岁。

由于罗绍秀优秀品质和作风影响，她的子女不负她的愿望，特别是她最小儿子刘军，在事业成功后，热心支持家乡建设，先后捐款数千万元资助信宜建设图书馆、体育馆、学校和一批市政设施。为宏扬罗绍秀先进思想和优秀品质，中共信宜市委、市人民政府于1999年10月决定以罗绍秀名字命名“绍秀图书馆”、“绍秀体育馆”、“大坡绍秀小学”，以作永久纪念。

隐蔽战线上的英雄陈达增

陈启著

陈达增（1913～2002年），男，1913年出生，广东信宜市水口镇双狮陈村人。中共党员。曾任解放军副团长、团副政委。

1920年至1929年，在家乡读书、耕田。1930年3月至1932年4月，在广州燕塘军校教导队当学员；1932年5月至1933年10月，在福建十九路军补充团一营任排长、连长；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在福建古田养病；1934年10月至1936年3月，在广州宪兵队任排长、副队长；1936年3月至1937年11月，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四分校当学员；1937年12月至1938年5月，在国民党一八七师任连长。1938年6月后，随十九路军爱国将领张炎从广州回到南路，在“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统率委员会第十六教导队”任区队长、中队长；1939年1月至1939年10月，随张炎在广东省第七行政区专署任参谋主任，期间被张炎派往湖南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学习，由中共军事教官边章伍、薛子正分别

担任敌后游击战术和政治工作的讲授。1939年，在广东省南路抗日学生队任军事组长；1939年12月，张炎被迫辞职，随张炎撤至湛江，在湛江由中共党员黄景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此后，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40年3月至1948年7月，由党组织派遣打入广东省第七行政区专署保安司令部任参谋主任；1948年8月至1949年9月，受党组织的安排回信宜，开始任信宜县师范学校军训教官，不久任信宜县（国民党）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总队长由县长兼任）；1949年10月至1950年3月，在人民解放军粤桂边纵队第五支队十五团任副团长兼营长；1950年3月至12月，在广东省军区南路军分区信宜县大队任副政委；1951年12月至1952年9月，在华南军区高雷军分区司令部任副科长；1952年10月至1954年11月，在粤西军区司令部民兵工作队任队长；1954年12月至1956年，在茂名县兵役局任科长；1957年至1959年由部队转业到轻工业部广州供销办事处任秘书科长、广东省轻工业厅秘书科长；1959年至1960年，在广州轻工业学校任办公室主任；1961年至1969年，任轻工业部广州设计院行政科长兼办公室副主任；1969年至1972年到“五·七”干校学习、劳动；1972年调回广州轻工业设计院工作，直到离休。2002年10月，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90岁。

陈达增从1940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至1949年10月，受党组织的安排，隐蔽战斗在敌人心脏里。

1940年3月，陈达增打入广东省第七区专署保安司令部后，以司令部参谋主任的身份，在高州城为中共南路特委领导人温焯华、潘文波两人找到较安全的住地，并公开声称这两人是自己的好友，解除别人对温、潘两人的怀疑。同时，经南路特委同意，

与中共党员陈鸿柱、李秀山等合股，在高州街开设一间“鸿泰祥”商店，由陈达增出面，动员七区保安副司令郑维缉入股，公开宣传“鸿泰祥”商店的老板就是郑维缉和陈达增。此后，很多共产党员都以洽谈生意、调运货物为名，在“鸿泰祥”商店进进出出和住宿，党的秘密文件、重要情报和武器等也在“鸿泰祥”商店随货进出，一时成为南路特委的革命活动中心和交通联络站，从未引起敌人的任何怀疑。

后来南路特委领导人温焯华转移到高州城西关居住。因住处来往人员多，引起隔壁一国民党法官的怀疑，派几个人紧紧盯住温焯华。在这十分危急的情况下，陈达增挺身而出，到那个法官住处闲谈，从中说明温焯华是自己的好友，保安副司令郑维缉对温焯华的情况最了解。由此，那个法官和几个盯缠者只好溜走了。不久，陈达增设法把温焯华转移到比较安全的高州城外的农户家居住。

陈达增认真做好对南路特委保护工作的同时，还突出做好内线的情报工作。他一到七区保安司令部，便迅速把七区专署和其所属的6个县的驻军布防、番号名称、驻扎地点、领导人姓名、兵员数量、武器装备等，一一列册秘密呈报给党组织。七区保安司令部分别派出情报员到各县了解和收集共产党的活动情况，定期向保安司令报告。作为司令部参谋主任的陈达增，经常向各情报员了解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报告，使党组织及时采取相应的防范措施和开展对敌斗争。国民党广东省保安司令部经常发来反共动态，通报共产党活动情况，发出反共指示等文件，陈达增一收到便设法送交党组织，使党的地下革命斗争进展顺利。

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广东省决定各专区定

期每月举行一次“党工汇报”，情况急时每月几次，特急时随时汇报。参加听汇报人员是：专署专员、保安司令、各县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县三青团书记等。陈达增设法参加每次“党工汇报”会，还以参谋主任身份作会议记录。有一次，国民党茂名县党部书记长熊某汇报到《高州国民日报》有问题，说“杨飞可能是共产党，云潭地区有共产党和游击队活动。”还详细汇报了郑奎（共产党员）在茂南活动的情况。接着，汇报会讨论决定对上述地区进行清剿、捕捉有关人员问题。会后，陈达增立即通知党组织，及时采取相应对策，避免了损失。又一次，在“党工汇报”会议研究决定从化州起运一批机枪等武器到高州检修。于是，陈达增把运这批武器的数量、时间、经过地方、护送人员与装备等具体情况及时向党组织报告。党组织派人在运送经过的沙田地方埋伏拦截，获得完全胜利。还有一次，广东省政府通知各专署、县要派一名“可靠”人员到曲江（当时广东省政府所在地）参加情况工作训练班，经党组织批准，陈达增设法争取到参加训练班。在班上陈达增以搞纪念册为名，把各专区、县参加的人员姓名、职务、通讯地址，一一列在册上，带回高州交党组织。1945年秋，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集中力量反共，七区专署派出特务到各县了解共产党活动情况，陈达增又把所派到各县的“中统”、“军统”特务名单、驻地和活动情况向党组织报告，使党组织采取措施开展对敌斗争。

陈达增在敌人心脏里做内线工作时，一方面把敌情向党组织报告；另一方面设法争取参加行动，从中做好保护和解围工作。1944年，有一次，七区专署保安司令部一个副司令带兵到化州围剿共产党游击队，陈达增也一起参加，这天下午正到化北山区驻

下时，发现住地对面有游击队转移，副司令正欲下令追击。陈达增对副司令说：“这里山高林密，地形复杂，游击队情况未明，天又快黑，去追不妥，弄得不好，定会吃亏。”这么一说，果然说动了副司令按兵不动，让游击队安全转移。还有一次，七区专署纠集几个县兵力，对化（州）茂（名）边境游击队进行扫荡，这对共产党游击队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在进军途中，陈达增主动接近参战的信宜武装领队陈英昌说：“老兄，在现在形势下，留点后路为好，不要做得太过火了，往后的日子还长呢。”这一说，陈英昌若有所悟说：“当然罗。”这不但动摇了陈英昌，还动摇了茂名县的领队杨爱周。因此，这次扫荡行动，只是马虎应付。1948年春，共产党游击队东征部队经过信宜，陈达增也参加七区专署保安队追击游击队，追到阳春西山境，如再追击下去，东征部队必定会受损失。陈达增急中生智，对带队人说：“共产党已走出信宜境，那边是别的专区别的县的事了，我们不应再找事干了。”这一说，那个带队的头目即下令停止追击。

1948年陈达增奉命调回信宜，打入信宜县自卫总队任副总队长。他利用副总队长身份，即把信宜县自卫总队的兵力情况、武器装备、驻防地点、军事计划、活动情况等掌握起来，迅速向党组织报告，特别是把国民党每次扫荡共产党游击队的行动计划及时准确报告党组织，使国民党的行动计划总是扑空而归。

1949年2月，共产党武装“叶挺”中队在怀乡的中垌村成立。国民党县警一个中队计划到中垌搜查，县委书记梁平接到陈达增送出的秘密报告后，指示部队主动转移，使敌人扑空。同年5月，云开地区成立有一百多人枪的云开大队。国民党信宜县长陆祖光纠集县警、自卫总队共800多人，分八路包围云开，妄图用“拉

网”战术消灭云开大队。陈达增将这一情报及时通知了云开大队，使云开大队避开了敌人的锋芒。敌人又一次扑了空。1949年夏季之后，中共信宜县委先后在各区组建区中队，紧密配合主力部队作战。8月初，主力部队粤桂边纵队第五支队第十五团从信罗边境重返云开，开仓济贫，发动群众，镇压反革命，革命形势迅猛发展。信宜县国民党反动派惊恐万状，制定了所谓“东西扫荡”的计划，妄图通过严密控制，把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各个击破。陈达增将敌人的计划意图事前报告了十五团，团党委经过详细讨论，作出了“敌进我进”，主力部队插进敌人兵力薄弱的后方的战略部署，完全掌握了战斗的主动权，结果取得了一连串的斗争胜利。最后迫使国民党信宜县的主力回守县城。

1949年初开始，陈达增利用一切机会接近信宜县自卫总队上层头目，多联系自己总队内的大队长各中队和士兵，常以谈形势，讲认识，说看法的形式去动摇国民党官兵的心。他常在不同场合说：“看来大势已去，再硬拼是会吃亏的，我们应见机行事，早点准备好出路。”他这么一说，那些中队长和士兵都说：“你这一见解有理。”有的当即表示：“以后看你眼色，跟你走。”在信宜解放前夕，从国民党军起义过来的陈赓桃部队已开进信宜县城东面的茂名县柴口地区驻扎，准备攻打信宜县城；解放军十五团也从北面逼近信宜县城，形成东、北面包围信宜县城的态势。国民党信宜县长陆祖光闻讯，胆战心惊，即找陈达增商量对策。陈达增故意撒谎说：“我与陈赓桃是老相识，还教过他，我可以劝他给点面子陆县长，叫他不要从信宜城来。”陆祖光一听此说，喜出望外，说：“真是好。”当即答应让陈达增去柴口向陈赓桃说情，还亲自请轿送陈达增前往柴口。这样，陈达增于1949年10月22日早上

到了柴口，会见中共高州地委派驻陈赓桃部队的党代表、高州地委委员车振伦，具体汇报了对信宜县城敌军的驻军情况，商定了攻打信宜县城的作战方案，确定信宜自卫总队起义的事宜，决定陈达增先回县城后半个小时左右，陈赓桃部队即开始攻打信宜县城。这天下午3时，陈达增一回到自卫总队，即召开大小头目会议，说：“陈赓桃部队已准备好解放信宜县城，他们人数多，装备又好，大势已去，我们再打已不行了。”正在开会间，陈赓桃部队已从城东连发几炮。这时，大小头目，个个目瞪口呆，六神不安，一致对着陈达增说：“由副总队长作主吧！”于是，陈达增立即下令说：“打已不行了，我们立即举行起义。”随即举起白旗，接着，信宜县自卫总队的两个大队、四个连官兵都按照陈达增指挥，就地放下武器，列好队伍，迎接解放部队进城。县长陆祖光眼看最后一线希望已成泡影，即带他的警卫连向城西逃跑。就这样顺利地解放了信宜县城。

至此，陈达增出色地完成了党组织交给他隐藏在敌人心脏里的战斗任务。为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为打入敌人内部任军事要职长达10年这段历史，受尽了残酷的批斗、折磨、迫害，却从来无怨无悔，坦然处之，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坚强不屈、心怀坦荡的高贵品质！

编辑家、作家、文艺理论家林元

罗康宁 陈启著

林元（1916～1988年），原名林抡元，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西岸村人，著名编辑家、作家、文艺理论家。

1916年7月14日，林元出生于西岸村。他青少年时代便受革命文学熏陶。1935年至1938年在广州读中学期间，就在郭沫若、夏衍主编的《救亡日报》上发表文章，还携同学创办《怒吼》杂志，宣传抗日救国。在该杂志创刊号上，他发表了剧本《汉奸陈觉生之死》，并组织“挣扎剧社”演出了该剧。

1938年，林元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读书期间，他担任进步学生团体“群社”的宣教工作，并主编该社机关报《群声》，同时参与创办“冬青”诗社，开展革命诗歌运动，宣传抗日与民主。1942年毕业，继续在昆明从事编辑和文艺创作，创办了“文聚”社，主编《文聚》杂志和《文聚丛刊》，发表了杨刚的长诗《我怀念你呀，莫斯科》等一系列进步作品。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

创办并主编《独立周报》，将原《文聚》杂志改为该报副刊。同年12月1日，昆明爆发了争自由、反内战的“一二·一”运动，林元即以《独立周报》的《文聚》副刊为阵地，发表“一二·一”运动特辑，其中有冯至悼念烈士的著名诗作《招魂》、李广田的诗作《我听见有人控诉你》，卞之林的散文《血说了话》等，他还用社论的形式发表了《对“一二·一”运动如何才能公平处置？》一文，责问蒋介石政府。

1947年，林元到广州中山大学中文系任讲师，兼办中山大学文学院院刊《文学》；1948年秋，由费孝通介绍赴上海任《观察》周刊编辑，同年冬代理总编辑；年底，该刊发表了一篇反映淮海战役的通讯，因而被国民党查封，蒋介石亲自下令缉捕撰稿人，林元坚不吐实，保护了撰写通讯的作者。直到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林元才恢复自由。

上海解放之后，《观察》杂志复刊，1950年迁往北京，改名《新观察》。林元任该刊编辑、编辑组长、编辑部负责人、编委。1953年以该刊记者身份参加以贺龙为首的赴朝鲜慰问团，发表了十多篇反映抗美援朝战争和战后朝鲜的散文和报告文学，后分别汇集出版。1959年，林元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0年，林元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对外联络委员会工作，历任办公室主任、中国作家协会驻科伦坡亚非作家会议常设局代表、亚非作家常设局北京执行书记处中国代表，并参与编辑该局机关刊物《号召》。

1978年底，林元被任命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业务办公室主任和编审，并受文化部委托，创办大型综合文艺理论刊物《文艺研究》，此后一直主持该刊工作。他年事已高，体弱肢残，右腿

胯骨断裂，且患有腰病，但他以坚强的意志克服困难。行走不便，他干脆住在办公室，食在办公室，简朴三餐，每周回一次家。可是遇到一些重要的编辑计划和选题，却拄着拐杖，亲自出门去落实。他主张学术民主，争鸣自由，支持学派，不搞宗派，同时关心和培养文艺新人。著名女作家柯岩，是林元的学生，数十年来，林元一直关注着她的进展。当读到柯岩的诗作《又见蔗林，又见蔗林……》时，立即写了封热情的长信，鼓励她“不断地探索追求”，信的末尾说：“你不断另辟蹊径去攀登艺术的高峰。胜利是属于智慧、勇敢、坚毅、不断地追求的人！”这封信，使柯岩“十分激动，一读再读，心潮起伏”。西安市有一名青年陈孝英，30多岁写出文艺论文《谈幽默》，在林元和编辑部其他人员帮助下，水平不断提高，后被提拔为陕西省戏剧研究所主任。1986年，林元退居二线，任《文艺研究》名誉主编。他仍然坚持为刊物操劳，为文艺事业的发展操劳。1987年8月，他扶病参加在大连举办的中国艺术节，看到祖国文化事业欣欣向荣的景象，作诗四首。第三首中写道：“为盼艺术结硕果，剪枝护花五十年”。在病危中，他还惦念着《文艺研究》，给编辑部留下嘱托：《文艺研究》要坚持党的文艺方针，坚持五湖四海，继续解放思想，不断前进。

林元热爱故乡，对故乡的文艺事业尤为关注。1983年，他回到信宜，目睹故乡新貌，感受很深，写下散文《看山还是故乡青》。对信宜的作者，他热情关注，亲切指点，直到1988年2月1日，他在病危时接到罗康宁编著的《信宜方言志》，立即抱病阅读，这时他已经不能动笔，仍然亲自口授，请人记录，给作者回信。信中写道：“病在医院里收到大作《信宜方言志》，使我仿佛回到了故乡，一遍又一遍地听到乡音，弥足安慰。”同时还口授了一首题

为《遥寄水湛叔》的诗，托罗康宁代投给《信宜文史》。

1988年4月2日下午2时55分，林元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2岁。他留下遗嘱：一是遗体献给国家科研事业，不留骨灰；二是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及追悼会，以免劳民伤财；三是将自己收藏的齐白石4幅画献给国家。遵照他的遗嘱，不开追悼会，只开了个学术讨论会。

林元的著作十分丰富，有散文、小说、报告文学、文艺论文和评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散文集《访战后朝鲜》、小说《大牛》。文艺评论《文如其人谈杨朔的散文风格》、《论齐白石的题画诗》等。他逝世后，亲友精选其部分著作编成《碎布集》出版。

中共党史专家廖盖隆

陈启著

廖盖隆（1918~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学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

廖盖隆，1918年3月20日出生于广东省信宜白石镇扶龙蔗坪村的一个贫农家庭。1930年至1932年，在白石吐珠小学读书。1932年至1935年，在信宜怀新中学读初中。1935年至1938年在

广东高州中学高中班师范科就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他和一些同学组织了“星期日下乡抗日宣传队”、“抗战剧社”、“新书合作社”等爱国团体，从事抗日宣传。1938年8月，他带领部分进步同学奔赴延安，进入陕北公学34队、高级第4队学习，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在延安马列学院学习。1940年初在马列学院中国问题研究室工作，研究并讲授中国现代革命史。1941年4月调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任经济组财政小组组长，并被聘为中共中央主办的《解放日报》特约撰稿员，发表了多篇关于国民党财政危机的论文。1944年4月调《解放日报》社，先后任国民党统治区新闻部副主任、主任，国内新闻部副主任、主任。撰写和发表了有不少影响的论文。1946年调新华社，先后任国内部组长、副主任、主任、新华社副总编辑等职务。在此期间，他于1950年撰写了《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一书，阐述了解放战争胜利的过程和必然性，回答了当时人们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从而加深了群众对党的正确认识。此书曾广为发行，后被选为高中教材，改名《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并以《从延安到北京》为书名翻译成英文出版。

从1951年1月起，廖盖隆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处、报纸处任副处长、处长（即局长）等职务，兼任抗美援朝总会宣传部副部长。1957年6月后的四年，先在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历史组工作，不久任朱德政治秘书。从1961年7月到“文化大革命”前，在中共中央联络部西亚非洲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任《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一书的编写组长。曾主编内部出版的《非洲手册》。

“文化大革命”中，廖盖隆遭受迫害。1975年1月恢复工作，1978年任中共中央中联部西亚非洲研究所所长。1979年出任中共

中央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委员会办公室（后改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参加了国庆三十周年叶剑英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之后一段时间还参加了《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工作。

1980年1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廖盖隆被任命为副主任，主持日常工作。同年，兼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还担任中共党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还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为了推动全国的党史研究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创办了《党史通讯》、《党史研究动态》、《中共党史文摘年刊》等刊物。由他主持编写和修改的《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以其内容精练、史料翔实，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经多次增订，至今发行数百万册，成为党史、现代史工作者案头必备的工具书。廖盖隆在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工作期间，曾就党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组织多次学术讨论和史料考评，澄清了党史中一些重要的疑难问题，为推动全国党史研究和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6年11月后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参加起草党的“十三大”报告。1990年6月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廖盖隆离职休养。

廖盖隆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工作。他勤于富余，著述颇丰。除散见于报刊的一些论文外，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1950年）、《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4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1955年）、《党史探索》（1983年）、《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83年）、《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胜利》（1987

年)、《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88年)、《毛泽东思想史》(1993年)、《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1995年)、《中国和全球走势》(1996年)等。这些著作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配合党的各项工作,起到了广泛的、有益的积极作用。

他担任主编的有《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1987年)、《社会主义时期党史的研究方法》(1987年)、《新中国编年史》(1989年)、《中国共产党历史大辞典》(1991年)、《中国共产党发展事典》(与丁晓春等共同主编,1991年)、《中国共产党的光辉七十年》(1991年)、《中国共产党七十年(画册)》(与谷长春、蒋齐生共同主编,1991年)、《中国名人大辞典》三卷(与范源、罗竹风共同主编,共收人物3万多人,1991~1993年)、《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与孙连城共同主编,1993年)、《社会主义百科要览》(与梁初鸿等共同主编,1993年)、《现代中国政界要人传略大全》(与刘佑兴等共同主编,1993年)、《抗日战争写真》(1996年),此外,1982年至1987年还主编出版了《中共党史文摘年刊》6册。

廖盖隆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实践是真理唯一标准的讨论中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坚决拥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正确领导,不遗余力地宣传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对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等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领域的重要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得到思想理论界的好评。

廖盖隆工作认真,勇于负责,富有开拓进取的精神。他遵循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党史研究、学术讨论等

工作中，提倡以确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拓宽视野，独立思考，大胆提出新观点、新论断。他的这种精神，极大地影响了史学工作者。刻苦学习，孜孜不倦，是廖盖隆突出的优点。即使在他离职休养后，仍然读书不倦，笔耕不辍，屡有新著问世。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向周围的人学、从书本中学、从实践中学，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时代洪流中，成长为著名的中共党史学家。长期以来，他自己动手积累资料，写读书笔记，认真记录各种会议上有价值的发言，无论参加大小会议，均事前认真写出发言稿，表现出对待工作一丝不苟的精神，受到广泛的称道。

廖盖隆坚持原则，作风正派，生活俭朴，廉洁奉公，刚直不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待人热忱宽厚，乐于助人，积极主动培养青年，奖掖后进，深受人们的敬重。

廖盖隆的一生是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不息的一生。他勤奋工作，严谨治学，把毕生精力奉献给党的事业。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他的业绩和风范，勤奋的治学态度，不倦的探索精神，开明的领导作风，忠厚的长者气度，是党史工作者的楷模。

廖盖隆，因病于2001年6月23日18时5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周岁。

与爱人同赴刑场的革命烈士丘壁坚

陈启著

丘壁坚（1918—1948年），原名丘玉莲，女，广东省信宜市怀乡镇中堂村人，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革命烈士。

丘壁坚于1918年10月14日出生不久，父亲便病故，她与母亲、姑母一起生活。5岁就读于本村私塾，1938年入福岗小学五年级肄业。

丘壁坚小时，家里曾将她许配给贵子镇一个姓张的有钱人家。她坚决反对封建婚姻，加上家庭经济困难，毅然放弃读书机会，取“坚如铜墙铁壁”之意，改名丘壁坚。1939年1月，与姑母丘惠文一起，考上广东南路抗日自卫工作队，学习、训练了3个月，被派回怀乡办民众夜校，宣传抗日。是年11月，又与丘惠文一起，参加信宜抗日救国乡村工作团，下农村宣传抗日救国、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汉奸卖国贼的罪行。她阅读进步书报，思想觉悟大大提高。

1940年，国民党反动派声称信宜抗日救国乡村工作团有“异党”活动，进行搜查，驱逐香港回国服务团的人员，逮捕工作团

团员。丘壁坚按照中共信宜地方党组织的指示，串连其他团员，组织示威请愿，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错误行径，迫使信宜县政府释放被捕的三名团员。不久，工作团成员丘国宣被捕，她与丘惠文一起，对工作团团长林树辉（国民党人）说：“你是团长，如果工作团有‘异党’活动，就是你有‘异党’活动；如果你没有‘异党’活动，就应该叫他们放人。”国民党反动派只得释放丘国宣。后来，中共信宜县地方组织负责人通知丘壁坚等人借机离开工作团。她回到家里，继续从事抗日宣传活动。是年11月，丘壁坚向共产党员丘惠文提出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丘惠文对她说：“革命工作是有危险的。你母亲就你一个女儿，怕死不怕死？”她说：“人生自古谁无死？……为了革命真理，怕什么！”经丘惠文介绍，中共信宜县地方组织批准，丘壁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接着，中共信宜县负责人在她家里举办信宜县第一期共产党员训练班。她每日往返十多里到怀乡圩侦察敌情、买菜；回到家里便担负起警卫任务，又做好炊事员工作。一家全年收入稻谷12担，她动员母亲拿出6担支持革命活动，只留6担作口粮（平均每月只有50斤）。她的家成了信宜县革命活动的交通站、中共信宜县负责人的“大本营”。

1941年9月，丘壁坚遵照中共信宜县地方组织的安排，进入信宜怀新中学读书。她经过详细调查了解情况，认真分析教师、学生现状，培养、依靠进步女同学开展学生运动，她的堂侄女丘虹（原名丘立吾）是高年级同学，布置丘虹出面工作。1942年“三八”国际妇女节，由怀新中学三年级女同学发出通知，召集怀乡圩附近的中小学女同学、女教师、女职工等600多人开纪念“三八”节大会；丘虹按照丘壁坚拟定的讲话稿在大会发表演说，号

召女同胞行动起来，坚持抗日，争取解放。会后集队示威游行，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大行山上》、《全国总动员》，高呼口号，张贴抗日标语。

丘壁坚和丘虹的一系列革命活动，引起学校训育主任刘某的注意，通知丘虹去问话。丘壁坚布置丘虹要理直气壮、大讲“国难当头，抗日有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刘某质问：“你们纪念大会为什么有这样丰富的内容？！你们的后台是谁？”丘虹按照丘壁坚的布置和要求一一回敬，使训育主任一无所得。刘某不死心，派他的老婆“管理”女学生宿舍。丘壁坚迅速做好应急工作，通知凡阅读过进步书报的同学要严守秘密，把所有进步书报转移、收藏好。训育主任老婆在学生上课时偷偷地搜查女学生宿舍，什么东西也查不出来。刘某再次变换手法，突然在学校图书馆阅览室公开摆出《新华日报》、《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宣言》、《大众哲学》等进步书报。丘壁坚指出这是一个圈套，是一个阴谋，千万不要上当，并告诉大家绝不要到图书馆阅览室去。结果，训育主任还是一无所获。刘某着着失败之后，决定不让丘虹参加毕业考试。丘壁坚叫丘虹把这件事向同学公开，激起公愤，全班同学向学校当局提出抗议，要求收回错误决定，否则全班罢考。学校只得准许丘虹参加毕业考试。

丘壁坚通过学生运动，在怀新中学培养了一批共产党员对象，并介绍罗素秋、罗琼加入中国共产党。

当局察觉出，怀新中学学生运动主要组织者是丘壁坚，却没有证据。等到丘壁坚由一年级升二年级时，故意将她期末考试的音乐、图画、体育评为“不合格”，操行列为“丁”等，逐出学校。

1942年秋，丘壁坚遵照中共信宜县地方组织的安排，考进广

雅中学（当时该校迁至信宜县水口村）读书。1945年1月，奉命到朱砂棣棠小学任教。是年5月，亲手发展经自己培养的丘虹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把朱砂、旺沙、贵子等地的几名共产党员组成党小组，她担任组长；在朱砂、旺沙建立起交通站，既保证中共信宜县负责人来往安全，又为领导机关提供可靠情报。这年寒假，她还根据中共信宜县特派员的指示，利用宗族关系前往钱排、合水活动，找到两个小学教师名额，由信宜特派员安排共产党员前往任教，开展秘密革命活动。

1946年2月，共产党员王素徽、梁景燊从旺沙转移到另一地方，在丘壁坚住处落脚，然后在朱砂圩投寄党的宣传品，不慎被敌人发现，第二天早上被捕。丘壁坚的处境也十分危险。但她临危不惧，立即把情况向党组织汇报，并组织营救。当国民党警察局传讯她时，她机智沉着，坚持说王、梁二人到他家后即打麻将牌，没有出过门。又跟她的房东陈某讲明利害关系，要他出面作证。并托人去做邮政所人员的工作，动员他们到国民党县警察局认证时，说明投寄传单的人“男的花脸，女的是中年妇女，不是青年人”。迫使敌人承认错抓了人。王、梁二人获释。

1946年8月中旬，丘壁坚奉命到电白水东交通站工作，在完成交通任务的同时，还主动护理正在生孩子的共产党员梁某。

1947年1月，丘壁坚转移到肇庆地区新兴县，协助她的爱人、共产党员梁特立开展革命活动。这年底，她生下了一个男孩；但她顾不上休息，刚生下小孩就照样工作。次年1月，梁特立到新兴县江延平中学任生理卫生和音乐课教师，她协助梁特立在音乐课中教唱思想性强的歌曲，激发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为启发学生和中学附近农民的阶级觉悟，丘壁坚同梁特立编排公演话剧《农

民》，其中有一段白榄：“我名叫李大叔，耕田越耕越缩，餐餐食两碗稀粥，饿得肚子叽哩咕辘，……”深受农民群众欢迎。

新兴县延平中学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上级党组织决定让一批党员转移。1948年7月中旬，丘壁坚和梁特立一起，随同共产党员严千年到云浮县腰鼓区思劳村开辟新的革命据点。丘壁坚深入农民群众中访贫问苦，发展了3名共产党员，还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参加游击小组，并于同年9月间送一批组员到新兴参加武装部队。

思劳村有个农民自发组织“老更队”（农民自卫武装队伍），其任务是：晚上巡逻放哨保护生产，维持地方治安。该队有几十个青年农民，长短枪10多支（均用祖尝租购买）。丘壁坚、严千年经过3个多月工作，已掌握“老更队”部分队员的枪枝；计划等全部掌握“老更队”人员、武器后，便发动武装起义。在这个关键时刻，敌人发觉了。1948年11月18日晨，高云新联防队和云浮县保警二中队共200多人把思劳村包围，丘壁坚和梁特立不幸被捕，严千年也于同一天上午在腰鼓容华中学被捕。国民党反动派将他们解往云浮县腰鼓区牢房囚了7天。敌人严刑逼讯，残酷拷打，而他们铁骨铮铮，忠贞不屈，坚决不泄露共产党的秘密。

1948年11月25日，丘壁坚等3名共产党员被押解到高要县水口圩的国民党广东省第三清剿区司令部一个据点。翌日下午，丘壁坚背着不满周岁的孩子，同爱人梁特立双双走向刑场，她昂首阔步，神态自若，一路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当地人民政府把她和梁特立、严千年的遗骨迁葬于云浮县思劳村对面山坡上。墓碑上署着：“思劳公

社烈士墓”。

抗日战争空军英雄梁深

陈启著

梁深（1919～1992年），男，1919年出生，广东信宜市镇隆镇天后街人，抗日战争爆发后，满怀爱国热情，投笔从戎。先后在黄埔军校十五期、民国中央航空学校十二期学习并毕业，在民国空军第一大队任飞行领航员、轰炸员；1943年赴卡拉奇（今属巴基斯坦）接受美式新机训练，返国后编入由中美双方共同组成的中美空军混合团任职。从此他便与美方人员比翼长空并肩作战，打击日本侵略者。

在对日作战中，梁深曾参加过多次会战，历过不少危险。在支援常德会战的20多天里，他每天出动两次执行对敌轰炸任务，每次都与敌零式战斗机遭遇发生恶战。1943年12月，梁深奉命飞往香港仁 码头轰炸满载飞机配件的敌轮，尽管受到敌人高射炮火猛烈射击，他仍沉着瞄准投弹，将敌轮炸沉。1944年中原会战之初，他参加执行轰炸黄河铁桥的任务，阻止日本侵略军利用铁桥向河南进兵。当日军由中牟渡河沿平汉线向新郑、许昌南下时，他驾机向敌军纵队俯冲扫射，拖延敌军前进。在许昌保卫战中，梁深与坚守该城的二十九师（师长吕公良）配合默契，予敌以沉重打击。有一次，敌军已由东关攻入城内，梁深发现地面守

军摆出求援布板信号，立即向侵入城内之日军猛烈扫射，我军及时反攻，将阵地收复。

梁深不仅具有高超的作战技能，而且作战英勇，沉着机智。一次大编队轰炸海口敌占机场，梁深向领队伍少校（美军）建议，采用迷惑战法，由桂林起飞，先向北，飞出数十公里，突然转向南，直奔海口。由于敌措手不及，未能升空应战，我机群没有遇到抵抗，海口机场一举被炸毁。

梁深经历的空战中，以轰炸武汉日军空军基地的战斗最为激烈。当中国混合大编队刚进到武汉外围幕阜山上空时，即遭到数十架敌机的突然拦击，一场激烈混战在武汉地区上空展开。在混战中，突然有两架敌零式战斗机向梁深逼近，梁深镇静沉着机智，立即用机枪对敌机猛烈发射，将其一架击落，另一架被击伤仓惶逃逸。梁深获国民政府军功奖及勋章奖，成为空军英雄。

1944年底，梁深调到空军第二大队，支援友军向桂（林）柳（州）反攻。担任反攻任务的主力是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中国部队，旗开得胜，克独山、下宜山、收柳州，未及三月即光复桂林。梁深在这次作战中对敌轰炸扫射，连连获胜，制空权完全为中方所掌握。从整个战局看，日寇已开始走向失败，彻底失败为期不远了。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梁深既欢乐，也深感忧虑。1946年6月，国共和谈破裂。面临严峻的局势，梁深对前途命运进行认真思考。他说：“抗战胜利了，人民需要休养生息，国家亟待医治战争创伤。如果再有人迫使我卷入内战，掉转枪口打自己人，我坚决不干！”为此，上级派他出国学习，他借故推辞，称病请假，毅然回到广州观变待机。在这期间，他多次赴香港秘

密串联在两航工作的同期同学陈礼达、郑重煌等人准备架机起义，回到人民怀抱。

1948年11月，梁深作“引桥”与中国人民解放军联系，参与组织中国航空公司及中央航空公司在香港起义，飞行人员驾机十二架，北飞回归祖国。为中国人民空军事业作了贡献，立了大功。新中国成立后，梁深在中国民航航测大队及专业飞行大队任驾驶员、领航飞行员。1980年，任中国民航天津局领航主任、调度室主任；1988年，经国家民航局批准，授予高级航行工程师职称。

梁深作为领航主任，肩负着架机探矿的艰辛任务。多年来，他战酷暑，斗严寒，飞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在航测大队期间，运用航测技术，发现了目前全国最大的铀矿，为国防工业提供了丰富的重要资源。他撰写的论著《空中航行学》、《机场各种穿云及进近着陆的航行线设计》等在国内发行，为民航在坏天气如何安全飞行、着陆等提供重要技术资料。同时，晚年还登上航空学校讲坛，向中国民航学生传授理论知识，为民航队伍的发展壮大作出重要贡献。

梁深因病医治无效，于1992年逝世，享年74岁。

血沃钦州的革命烈士林芳

陈启著

林芳（1923～1945年），又名林国兴，广东省信宜市镇隆镇俊耀村人。学生运动的优秀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共钦州特别支部书记、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政治处主任。革命烈士。

林芳自幼失母，由叔祖母扶养长大。1937年秋考进信宜中学。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如饥似渴地阅读进步书刊和共产党的书报，思想进步很快。

林芳所在的初中二年级的班主任，是国民党信宜县党部书记长兼该校校长手下的人，经常在学生中灌输拥蒋反共的反动思想；他不学无术，常读错字，学生引为笑柄。在这个班升到三年级时，他公开声称要跟班当班主任。林芳同进步的同学一起，一面指出他无法辅导学校高年级的功课，不能让他误人子弟；一面受全班同学的委托，起草了一封给三年级原班主任的公开信。结果，学校当局被迫接受了同学们的要求。

1940年3月，林芳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他初中毕业，遵照共产党组织的安排，与10名党员考进广东省立广雅中学，成立了广雅中学西迁后的第一个共产党支部。林芳是高一班“十月社”和“真社”干事会的主要成员，为这两个团体编墙报，并积

极撰稿，写了不少杂文、短评、诗歌、散文以及短筒小说，宣传革命道理。他还将同学组织起来，成立读书会，传阅和研讨进步书报，及时组织同学讨论学习心得，以提高他们的觉悟。假期回乡，看到农民生活困难，有的家庭遇到婚丧等疾病，往往借贷无门，他就串连农民组织“生产互助合作社”以帮助困难家庭渡过难关。他通过各种方式教育本乡青年，在提高阶级觉悟的基础上，进行共产党的知识教育，先后吸收一名农民、两名学生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一个党小组。

1941年12月，中共南路特委从广雅中学抽调林芳等两人到钦州开辟新区，并决定成立中共钦州特别支部，林芳（从这时起改名林国兴）任特别支部书记。1942年，林芳在黄屋屯中心小学任教，在这期间，他培养了两名青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其中一名是女青年苏萍，后与林芳结为夫妻。他们结婚时，只在当地报刊登一则结婚启事，不添置一件衣服，不买一件家具，不宴请一个亲友。将钱节省下来作为进行革命活动的经费。为了不影响工作，他们相约婚后不生育。1943年，林芳任钦州镇第八保校（地藏庙小学）校长。1944年调到钦州小董镇，负责小董区的工作。夏秋间，日寇为了缩短战线准备从南洋退却，妄图打通桂林邕钦线，因而从钦州登陆。此时，钦州大部分地区已处于敌后状态。为了开展敌后武装斗争，林芳向国民党小董区公所的自卫队做工作，并跟其中为首的几个人结为拜把兄弟。1945年2月17日，中共领导的钦州小董武装起义爆发，林芳任起义队伍钦县人民抗日解放军政治处主任。分队的全体人员带着全副武装，包括一挺轻机枪参加了起义。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受到挫折。分散转移时，林芳和一些战友一起准备到海区隐蔽，在久隆附近被国民党顽固派

认出，于同年2月26日不幸被捕。顽固派专门组织了所谓“特别法庭”，对他进行了多次“审讯”。林芳虽经受严刑拷打，威迫利诱，但他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充分表现出共产党人的革命气概。1945年3月10日，林芳和一起被捕的8位战友在钦州城郊牛圩陂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22岁。

著名农民作家杨干华

陈启著

杨干华（1942~2001年），男，1942年1月30日（辛巳年十二月十四日）出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广东省信宜市思贺镇到堆村人。中国共产党员。一级作家。历任广东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党组成员，广东文学讲习所副所长，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作品》文学月刊社社长、主编，广东省第五、六、七届政协委员等职。

—

杨干华小时是在思贺梁氏办的学堂俊秀小学读书。他学习成绩非常好，是班中优秀学生，特别得到老师的宠爱。12岁考入信宜合水中学（当时称信宜县第五初级中学）甲班，享受助学金学习。在读书中，起先受解放军、人民志愿军战斗英雄故事的影响，

确定自己奋斗目标是，长大后参加人民解放军，当不怕牺牲的战斗英雄。但不久，很快又想当一名作家。因为他的第一篇作文《记一次愉快的劳动》，受到语文老师的表扬，并在课堂上公开宣读。这次表扬，使杨干华对文科的兴趣大增。教导主任也是学校的语文老师，常常引经据典进行生动的演讲。杨干华觉得再没有比语文这个学科高级的了。于是，一有时间就跑到阅览室、图书馆，争分夺秒阅读《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同时，还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苏联小说。他读后才知道课外书竟有一个令人神往的文学世界。

1957年，初中三年级最后一个学期，他忘乎所以，作文时大谈作家的伟大理想，把数理化外语置之不理，老是写稿、投稿：什么童谣、民歌、小幽默、小谜语……，结果，这一年升高中考试，一败涂地，只得回乡。

他回到家里，发奋复习功课一年。1958年又考上母校合水中学。这年，正是“大跃进”年代，他的文学才能得以充分发挥。他创作的小议论《大胆的吃》在《南方日报》发表，诗作《筑起水库绿汪汪，养条鲤鱼丈八长》登在《羊城晚报》上；还有小小说发表在《作品》（广州）、《青年报》（上海）等报刊。

1959年，他写了一篇《新狂人日记》，引来全校师生召开大会，批判他的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幸好，当时的校长不让第二次批判，保护他过关，并让他转学到广州，但不成功，后批准停学一年，避过当时风险。1961年复学。1962年高中毕业。

二

他在复学后，仍痴迷文学写作。他的作品乡土气息浓厚，人

物形象生动，语言幽默有趣。先后在广东省报刊发表了小说《姐姐要出嫁了》、《秋风秋雨》、《石头奶奶》、《我的妻子》、《选婿风波》，诗作《风雨中》等；山西省《火花》杂志发表了小说《父子春秋》；叙事长诗《铁匠之歌》在广东《作品》月刊上发表。

1962年夏天，高中毕业后，他一头扎进云开大山里，作短暂的旅行和了解民情风俗，避开高考，开始了农村农民社员的生涯。

1962年冬，他和同乡女青年梁权美结婚。婚后第三天离家赴广州参加广东省作家协会举办的文学讲习所学习。

1963年，他的短篇小说《石头奶奶》获《羊城晚报》二等奖，《阿靛回故乡》获《南方日报》奖励。之后，与广东其他3个作家合出四人集《俏妹子联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杜埃在《作品》月刊上作较为全面评价杨干华作品的评论，题目是《带刺的生活小故事》。

1965年冬，杨干华参加了《人民文学》社在北京举办的读书班学习。不久，他又被选为全国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的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会议。杨干华接连两次上北京，瞬间成为信宜山乡的特大新闻，大喜事，到处传诵。

三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长达10年，杨干华受迫害，当民办教师的资格没有了，回到生产队当社员参加劳动。他把回生产队时学校给的几十元生产费买了自行车，利用假日或黑夜上山打柴，帮助供销社运货。经过一段时间实践，他居然炼出用自行车运货的硬本领，以他不足100市斤的体重，能连人带货载上500市斤，翻山越岭，赴危履险。有好几次跌下几丈高的崖下，幸好

没丧命。帮人运砖瓦时，还得钻入窑洞去承受高温的灼热。

为生产队集体干活，他总是走前头。为了生产队筹集买肥料的资金，他同社员一起到国营八一林场去打短工，扛杂木，放木筏，早出晚归，不论太阳晒、大雨淋，都坚持干到完成筹集资金计划为止。此外，学雷锋，他给办喜事的社员做客郎做挑夫，平时替人写情信，撰写对联，做典型化的总结，不怕苦累；还义务扛过棺材、埋葬死婴；为文化室写过不少演唱材料。

1969年国庆20周年时，杨干华编写的《0.001》剧本，思贺公社文艺宣传队拿来排练到县里参加汇演，受到好评。于是，他被留在县里一段时间，创作剧本。先后写了《猪场新歌》、《高山春早》两个剧本，都是以新生事物为歌颂对象，演出后均受到湛江地区和省里的重视，《高山春早》还参加省里的文艺汇演。

后来，虽然生产大队又安排杨干华当民办教师，但因一个弟弟在内蒙古农场被打成“内人党”、“反革命”，受不住严刑拷打，自杀了，年仅20岁。这个冤案使杨干华心灵大受创伤；他的四叔10天内先后有两个女儿夭折，他内外奔走，身心过瘁，终于病倒。1993年11月他在《从田野走来》的自传里写道：“那病很古怪，好象随时都会失去知觉的样子，腹部有一股上逆之气，总呕不完。心跳起来时，惊恐万状。中医说我患的是气郁症，又叫梅核气；西医则说我患的是肠胃神经官能症。从公社到县到省里的各大医院检查，一无所获，不得要领，此病一直在困扰着我。”后来，杨干华之死，与此病有极大关系。

1972年，杨干华被调信宜县文艺宣传队任编剧。此后，创作了不少粤曲、歌词、表演唱，大型粤剧，有的还到省里演出。其中《有件喜事告诉你》歌词，收入上海出版的一本歌集。这期间，

还偶而写一些小说、散文。他移植《逼上梁山》的粤剧比较成功，演出效果极佳。

四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文艺界迎来了创作的春天。杨干华重操笔杆子，在文学创作道路上迈开大步朝前走。

1978年冬，杨干华参加广东省举行的一次文艺界会议。欧阳山提出重组广东文学队伍，创办文学院。杨干华被列为主要骨干人物。

经过10余年的沧海桑田，世态人情，国难家事，命运际遇，杨干华跃跃欲试，一下子创作了《良心》、《被蹂躏的灵魂》、《输血》等几篇小说。此时，他更多考虑的是，从历史的，从文化的，从自身的进行解剖，并把多年跟农民一起得到的感受表现出来，迈出崭新的一步。于1979年初，创作出短篇小说《惊蛰雷》，塑造了钱金贵一个中毒不知毒，受极左路线迫害又用极左去迫害别的老干部形象，在小说里大胆歌颂了包产责任制。

《惊蛰雷》发表在《花城》杂志创刊号，曾收入多种版本。得到欧阳山、杜埃等老一辈文学家的赞扬。《光明日报》发表了评论家的评论文章，认为它和杨干华另外一篇《被蹂躏的灵魂》、跟全国其他10多篇优秀作品一样，较早地也较有特色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浩劫中农村的那段历史。后来，《惊蛰雷》获广东省首届鲁迅文艺奖。他的《输血》为法国《世界报》评价为“广东文坛优秀作家”。

五

1979年9月，杨干华调入欧阳山创办的广东文学院。报到后留在广州专门读书一个月。1980年春，召开广东省作家代表大会，杨干华当选为广东省作家协会专职副主席。同年4月，赴北京参加中国文学讲习所学习。他在这次学习班系统地学习了文学之外的美学、哲学、经济、政治等。对他创作上是一个转折，在文学的攀登超越上，其影响是不小的。

杨干华调入广东省作家协会，但仍留在信宜深入生活。在信宜县农业办公室挂副主任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有机会到处调查研究，对粤西的人文环境，历史沿革，风土人情，有进一步的认识，他说粤西“有一部大书，等待着我去写出来，不但有典型意义，而且有普遍意义。”

1982年出版了杨干华短篇小说集《惊蛰雷》后，他创作了中篇小说《天上的月亮》和《山里的太阳》。不久，他走出云开大山，走向珠江三角洲。1984年9月，按省作家协会的安排，举家迁入经济特区珠海市，在中共珠海市委政策研究室挂研究员职务。

从封闭走向开放，从狭窄走向广阔，从牧歌式的山乡走向现代化的都市。他无论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珠海很快创作出中篇小说《冬夜备忘录》，受到了各界的关注，一致认为这预示着杨干华将有作品出现。《冬夜备忘录》获“花城”文学奖。

1985年，杨干华的中短篇小说集《社会名流》出版。此后，他拟订了一部长篇的计划。决定以三部曲约80万字的篇幅，把中国农民千百年来希望、挣扎、奋斗、创业的艰难历程，尽可能深刻地、艺术地表现出来。

1986年，他完成了创作24万字的长篇三部曲之一《天堂众生

录》。这部长篇先在大型文学杂志《百花洲》发表，接着出了单行本。此作以从容不迫和幽默机智的文风，深沉痛苦和轻松洒脱的结合，达到了新的台阶。广东评论界开了研讨会，认为它是新时期广东文学一个重要收获。《文艺报》发了新作消息，在当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创作研讨会上，一致认为它是当年长篇小说佳作之一。1989年，《天堂众生录》被评为广东省庆祝国庆40周年优秀作品二等奖。同时提名全国茅盾奖候选长篇小说，并进入前20部佳作之一。

1991年春天，杨干华创作了他的三部曲之二《天堂挣扎录》，发表在《百花洲》文学杂志上，全书30万字。评论界以极认真和审慎的态度，对待这部小说。同年10月，在广州召开了《天堂挣扎录》研讨会，《文艺报》发表了评论文章，大多数认为这第二部比第一部《天堂众生录》有突破，有发展，是十分难得的超越。1992年，《天堂挣扎录》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广东长篇小说大奖。同年，杨干华也荣获广东省优秀中青专家称号。

1992年夏天，广东作家协会应邀组团，由杨干华担任团长访问美国，回国后，准备三部曲之三《天堂蹒跚录》开笔，此时，作协决定他出任《作品》主编。后又出访马来西亚，回国后走上主编岗位。在任主编的日子里，他写“主编絮语”短文刊在《作品》每期的前面，很有特色，受到中共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长于幼军的高度赞扬。至于三部之三《天堂蹒跚录》则一搁再搁，最终没有完成他的三部曲计划就逝世了。

他在担任《作品》文学月刊社社长、主编之后，偶而撰写一些散文，也反映了他的才能。如：《珠江水记》、《拱北记》、《信宜风采序》等，都属于经典之作。其中《拱北记》在1999年被评为

广东散文一等奖。

杨干华的作品，大多数以农村生活为题材，反映农民的喜怒哀乐。描写农村面貌形象逼真，刻画农村人物栩栩如生，语言生动、幽默，作品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他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为著名作家，从大山沟搬到了大城市定居，地位变了，环境变了，但农民的优良本质不变，生活还是那样朴实无华，性格还是那样醇厚豪爽，风度还是那样风趣大度，是一位深受农民赞誉的农民作家。

2001年3月29日，杨干华在广州逝世，享年60岁。

战场救护模范吕志金

陈启著

吕志金（1956～1979年），广东省信宜市贵子镇云世村人，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壮烈牺牲，是著名革命烈士。

吕志金，1956年12月24日出生于农民家庭。1964年入云世小学读书，1970年小学毕业；继而在云世小学附设初中班读书，1972年初中毕业。由于家庭生活困难，他没有读高中就回乡从事生产劳动。

1976年3月，吕志金应征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被分配到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一团”“大渡河连”当卫生员。在连队，战友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灵芝菌”。原因是这个连队的山东籍战士较多，他们的普通话带着浓厚的乡音，往往把吕志金读成“灵芝菌”，加上他是卫生员，谁有头痛发热，跌倒损伤，他就像灵芝那样去病除痛。于是，“灵芝菌”就成了他的“美名”。

“大渡河连”，有着光荣的传统。连队的战史上记载着这样动人的故事：解放战争时期，连的指战员昼夜兼程南下，追歼顽敌。一天，炊事班一位战士突然病例了，不能行走，副连长就背着这位战士强行军。第五天，副连长累得倒在地上，再没能爬起来。副连长牺牲后，连里别的同志轮流背起那个战士行军。就这样，这个战士在战友的背上养好了病，继续参加战斗。解放后，上级授予这个连队“南下三千里，阶级团结如兄弟”的锦旗。连队的光荣历史，深深地印在吕志金的心上，他决心以实际行动把英雄连队的革命传统发扬光大。他的思想进步很快，1978年，他光荣加入共青团。在短短几年内，受到团、营口头嘉奖各一次，荣立三等功一次。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还击战斗打响了，吕志金随部队上了战斗前线，担负救护任务。一上战场，吕志金就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了。攻打同登外围时，三排主攻六号高地。他跟着三排到火线阵地，刚抢救下2名伤员，见一排去攻打五号高地，又跑到一排的阵地抢救。接着二排向七号高地发起冲锋，他又随二排上了火线，一直马不停蹄地奔跑在三座海拔近五百米的大山中。每次上去，都扛上满满一箱弹药和药箱，下山又背着伤员。遇到火力封锁的开阔地，他就让伤员趴在自己背上，全身贴地，一寸

一寸地爬行。晚上，吕志金整夜守护着伤员，一会给这个喂水，一会给那个服药。十几名伤员在吕志金的精心抢救和护理下，脱离了危险，安全地送到了后方医院。吕志金却熬得脸颊发黄，声音沙哑，双眼布满红丝。

攻打六号高地时，七班副班长肖跃华爆破地堡，地堡炸飞了，他的头部被烧伤，头发烧得一根不剩。吕志金不顾炮弹在身边爆炸，子弹从耳边擦过的危险，急忙冲上去，用三角巾裹住他的头，又冒着炮火把他背起来就往下撤。肖跃华不断用拳头往吕志金的背上捶，叫嚷着：“放下我，我眼看不见，还可以留在阵地上压子弹。”吕志金生气了，冲着他厉声地说：“别乱动，你负了伤，我有责任救你下去。”硬是把他背到了营部包扎所。

晚上，吕志金又跟部队一起驻守在山头上。他背上药箱、急救包，冒着敌人的冷枪冷炮，逐个山头去检查战友们的健康情况，发现几个战士发烧，他立即给病号看了病，发了药。这天晚上，山上蚊子成群，咬得战士又痒又痛，不得安宁。吕志金见此情况，就跑到营部带回一箱防蚊药，逐个班发送。在奔走过程中，他被敌人的冷枪打伤，急救包被打烂了，满身是血，深夜才回到连部。

2月26日，我军攻打越南谅山市北面的屏障扣马山，吕志金随部队急行军。他身上的药箱、急救包和防毒面具等已有几十斤重，还从战士的肩上抢过一箱炮弹来扛。战士的干粮吃完了，吕志金把自己几天来节省下来的两包压缩饼干分给大家吃。晚上，部队攻占了扣马山，发现阵地的一个茅棚内有3筐面条和大豆，又饿又渴的战士们想马上煮来吃。吕志金及时制止说：“不行，要检查一下！”经他认真检查，果然发现面条和大豆都被敌人放了毒。由于吕志金有高度警惕性，及时有效防止了一场中毒事故。

2月27日，又一场激战在凉山北面的五三六高地打响。这个俯瞰凉山市的制高点，成了争夺的焦点，战斗达到了白热化，硝烟弥漫着整个五三六高地。连队的伤亡不断增加。吕志金一次又一次地冲进炮火中，把伤员抢救下来，身上积满了泥垢和血渍，精神和体力都疲乏到了极点。当他第四次从高地下来时，背上的伤员压得他喘着大气，脸色铁青，全身被汗水浸透了。仍坚持在弯弯曲曲的交通壕里转，走着走着，他只觉得头晕目眩，突然栽倒在地上。副指导员连忙给他灌了半瓶十滴水，扶着他的肩膀摇了好大一会，他才睁开眼晴。副指导员说：“你在下面管包扎，不要上去了。”吕志金却抢着说：“不行，不行，我是卫生员，我要上去。”副指导员说：“这是命令！”

过了一会，我军的炮弹又铺天盖地射向五三六高地，夺取主峰的战斗又开始了。吕志金惦挂着前沿的伤员，“霍”地跳起来，抓住药包，一口气冲到主攻排阵地。激烈的炮火震撼着大地，子弹发出呼呼的怪啸。战士们用交替掩护的战术，强行通过一个山坳。机枪手李加兴刚跃起来向敌人射击，突然一串子弹扫来，李加兴倒下了。吕志金奋不顾身的滚过去，爬在李加兴身边。可是那里的地形于他十分不利，四周的草木被烧得光秃秃的，连一棵小树都没有，更没有一点可供隐蔽的地方，敌人的子弹像雨点般不停地打过来，有两发已经穿过吕志金的药包。他想，转移位置吧，李加兴伤着了动脉，鲜血像喷泉一样涌出来，动弹不得，作为卫生员的吕志金，心里非常清楚，如果不及时急救，再过几分钟，李加兴将流尽鲜血。抢救战友的决心，不容吕志金犹豫，他心一横，左手紧紧压住李加兴的伤口，右手飞快地摸出绷带，往嘴上一咬，迅速缠在李加兴的伤口上。

此时，敌人发现了吕志金，马上疯狂地对准他扫射。吕志金用自己的身体掩护着伤员李加兴，突然，他的大腿被子弹打中。接着，又一颗子弹打中他右臀部，顿时鲜血湿透了他的下半身。但是，他忍着剧痛，两只手仍然紧紧抓着绷带，咬紧牙关继续给李加兴包扎。不料，又一颗子弹从背后打过来，穿过肚子，肠子立即从伤口流了出来，他又咬紧牙关，忍着极烈剧痛，将自己流出半尺长的肠子塞了回去，头部又被一颗子弹擦伤。吕志金全身剧烈地颤抖着，浸在通红的血泊中，七个伤口严重地威胁着他的生命！

然而，在生死关头，吕志金还是紧紧抓着缠在李加兴伤口上的绷带，每当他用力去拉紧一下绷带，自己身上的伤口就涌出一股血浆。最后，只剩下一个结没扎紧，吕志金忍着剧烈的疼痛，用头死死地顶着地面来减轻巨大的痛苦，积蓄着最后拉结的力量。李加兴伤口的绷带终于扎紧了，吕志金却昏倒在地上不能动弹了。这时乌云翻滚，瓢泼大雨直浇，山上山下到处一片水汪汪。战友们迅速把吕志金背下山坡抢救。他在担架上醒来，第一句话是：“不管我，先救小李，小李救活了没有？”战友们贴着他的耳朵说：“小李救活了。”吕志金听到后又昏过去了。第二次醒来，战友们给他喂饭，他说：“我不要紧，先给其他伤员吃！”就这样，在担架上几次醒过来，又几次昏过去。当时，天气很冷，战友们把一块塑料布盖在吕志金身上，他却说：“不要把我的眼睛盖住，我要看看李加兴，看看伤员！”在场的战士都感动得流下泪来。

当吕志金在担架上最后一次醒来时，问的是：“六班长伤势怎样了？抬下来了没有？”接着，在左边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给樊副指导员，用微弱而坚定的声音说：“请求党支部考察我。”这是他

几天前在战壕里写的入党申请书，这张入党申请书的纸角都磨烂了，纸上染着几滴鲜红的血迹。樊副指导员对他说：“吕志金同志，请放心吧，党支部会考虑你的要求的。”吕志金宽慰地满意地笑了。但由于流血过多，他渐渐安详地合上了眼睛，壮烈牺牲于担架之上，年仅 23 岁。吕志金烈士的遗体安葬在广西红岭烈士公墓，立有“吕志金烈士之墓”的石碑。

吕志金牺牲后，部队党组织根据他生前的志愿和一贯表现，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给他追记一等功。中央军委授予他“战场救护模范”的光荣称号。在众多的英模中，他是被中央军委直接表彰的 40 名英模之一。